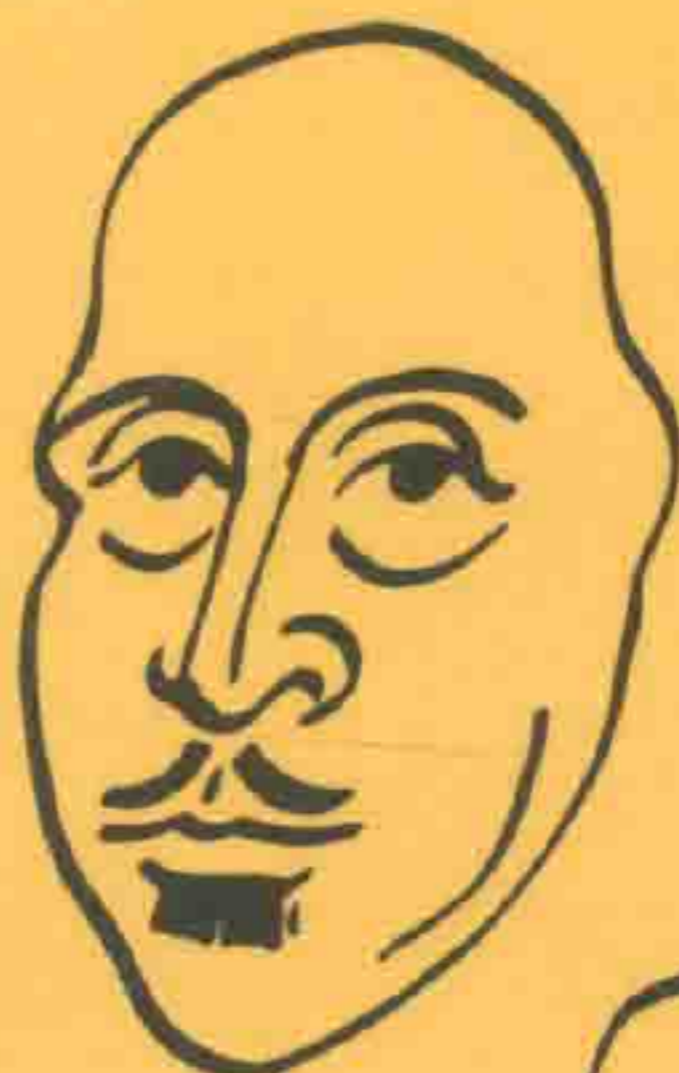


(你听过那个
关于黑格尔和否定的笑话吗?)

齐泽克



笑话

的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于东兴 译

严肃地道的哲学著作完全可以由笑话
写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生物老师对一小学生进行测试，考他各种动物，小学生每次回答时，总能把答案转到对马的定义上。“什么是大象？”“生活在丛林里的一种动物，那儿没有马。马是一种驯化的哺乳动物，有四条腿，被用来骑，在地里干活或者拉车。”“什么是鱼？”“一种没有腿的动物，不像马。马是一种驯化的哺乳……”“什么是狗？”“一种不像马的动物，会叫。马是一种驯化的哺乳……”如是反复，直到最后，绝望的老师问小学生：“好吧，那什么是马？”小学生傻了，完全找不着北了，开始一边嘟囔一边哭，什么答案也说不出来了。

上架建议：哲学

ISBN 978-7-5649-2466-9



9 787564 924669 >

定价：58.00元

Žižek's Jokes

Slavoj Žižek

齐泽克的笑话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于东兴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齐泽克的笑话 / (斯洛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
(德) 莫滕森编 ; 于东兴译.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49-2466-9

I. ①齐 ... II. ①斯 ... ②莫 ... ③于 ... III. ①哲学—
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726 号

Slavoj Zizek

Zizek's Jokes (did you hear the one about Hegel and Negation ?)

Copyright 2014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riginally published based upon an earlier publication *The Collected
Jokes of Slavoj Zizek.*, published by Flamme Forlag 2012 Audun
Mortens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X by HN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5-A-00000386

齐泽克的笑话

著 者 [斯]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于东兴

责任编辑 萧 歌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2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录

代序：笑话在猴子变人过程中的作用	1
齐泽克的笑话	3
编后记	151
著作年谱	160
关于作者及编者	163
注释	164
译后记	168



齐泽克的笑话

(你听过那个关于黑格尔和否定的笑话吗?)

斯拉沃热·齐泽克

和齐泽克其他的书不同，这本结构紧凑的笑话集——一些“黄得恰到好处”（他的词），另一些黄得不那么合适——精选自他的作品，为那些让他着迷的，特定的哲学、政治和性主题提供了一个索引。《齐泽克的笑话》里的圈套和警句——还有冒犯和侮辱——都是齐泽克的成名技，尽收在大约150页里。

对齐泽克而言，笑话是有趣的故事，可以为哲学领悟提供一种捷径。例如，他例证黑格尔的三段论，用了经典笑话“亲爱的，今晚不行，我头疼”的三个不同变体：先是妻子声称头疼，然后是丈夫；然后妻子要求，“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所以来我们搞一下让我放松放松！”关于一瓶啤酒的警句则提供了一个关于标签的拉康式课程。还有那个有名的关于“贵族”的笑话的“真正淫秽”版本，笑话里那个家庭提供的实质上是关于黑格尔思想的短课，而非难以启齿的表演。

《齐泽克的笑话》内含齐泽克英文作品里所有引用过、演绎过或讲述过的笑话（包括一些未发表的手稿里的），还有同一个笑话在不同语境下制造不同效果的不同版本。更重要的一点是，喜剧才是齐泽克的一本正经里的关键。

斯拉沃热·齐泽克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他是三十多本书的作者，包括《斜眼而视》(*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木偶与侏儒》(*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还有（和约翰米尔班克合著的）《基督的怪物：悖论或辩证？》(*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卷首及卷尾照片由亨德林克·斯派克(Hendrick Speck) 2008年拍摄于欧洲高等学院。

版权属于欧洲高等学院。

代序：笑话在猴子变人过程中的作用

在东欧共产党执政晚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政府里有一个秘密警察部门，职责是专门创作（不是收集）针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笑话。因为他们明白，这些笑话起着积极维稳的作用（政治笑话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简单且可容忍的，让他们吐槽和发泄不满的方式）。有趣的是，这个谣言忽略了笑话的一个鲜被提及但却关键的特征：这些笑话从没有作者，“谁是这个笑话的作者”像是个不存在的问题。笑话一出现就是“被讲述的”，它们总是已经“被听到”（“你听过那个关于……的笑话吗？”是耳熟能详的套路）。隐藏于其间的秘密是：这些笑话五花八门，体现了语言独有的创造力，但却是“收集”的、匿名的、无作者的，一股脑地不知道从哪儿一下子冒了出来。那种认为一个笑话必须有作者的想法完全是瞎扯：这意味着必得有一个匿名象征秩序的“其他的他者”，就好比语言那深邃且变幻莫测的原生力必得被拟人化，由一个偷偷拽着小绳的执行人掌控。

这就是为什么从理论视角看，上帝才是至尊

笑话大王。这也是艾萨克·阿西莫夫^①的迷人小事《笑话大王》^②里的主题^③：有假设认为，上帝把猴子变成人是通过给猴子们讲了个笑话（在上帝给猴子们讲笑话前，猴子们还只会比划着交流，是这第一个笑话启蒙了灵魂），为了支持这个假设，一群历史语言学家试图重构这个“母笑话”。（顺便提一下，对有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信徒来说，这种做法纯属多余，因为都知道这个笑话原来是：“别从知识之树上吃东西！”^④——上帝的头道禁令明显是个笑话，诱惑，却又观点不明，令人费解。）^⑤

① 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20—1992)，美国生物化学家、作家，以科幻类小说闻名。书中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后同。

② Jokester，科幻短篇，发表于1956年12月，讲述人类被外星人统治时期，为一台超级计算机所管理。有科学家试图探寻人类幽默的起源，之后被超级计算机告知，幽默包括其基本实现形式双关语，都是外星人研究人类的工具。人们对笑话的反应不同是程序提前设定的结果。一旦人类发现这个秘密，实验即终止，人类也就丧失了幽默感。

③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齐泽克的臆造或再创作，原著中既没有提到上帝，也没有提到猴子和历史语言学家。

④ Genesis 2:17，原文为“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吃就不辨善恶，吃了就死，吃还是不吃？

⑤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Verso, 2012), 94–95.

齐泽克的笑话

三个白人和两个黑人

我们应该重读拉康关于逻辑时间^①的文本，其间他对三个囚徒的逻辑难题做了精彩诠释。原始版本不太为人所知，是一个掺杂了性和冷逻辑的18世纪法国黄段子（萨德^②收集）。在这个色情版本里，一个女子监狱的典狱长决定赦免三个女犯中的一个，而赦免依据是谁会在一个测试中表现得更聪明。所谓测试，就是三个女人趴在一张大圆桌旁围成三角，每个都下身赤裸，便于后人，然后被一个白人或黑人从背后搞。因此，她只能看到她面前搞其他两个女人的男人肤色；女犯所能知道的全部信息是，典狱长在测试中提供了五个男人，三个白人、两个黑人。基于上述限定，胜者是那个最早能确定搞自己的男人是什么

① 拉康精神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由拉康于1945年提出。逻辑时间是一个辩证的三方主体结构，分别为所见之瞬时、理解之时和总结之时。逻辑时间和物理时间不同，并不参照于时钟，而是特定逻辑连接的产物。逻辑时间是相对稳定的共时结构，而非前后相续的线性流动。

② 萨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情色作家。

肤色，然后推开他并离开房间的人。这里面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比一种复杂：

◎第一种情况，两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在搞那些女人。由于被白人搞的女人知道这里只有两个黑人，她可以立即起身离开房间。

◎第二种情况，有一个黑人和两个白人在搞。那两个被白人搞的女人因而会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被黑人搞的女人会看到两个白人，但因为这里有三个白人——她也没法立即起身离去。第二种情况下，胜出方式只能是被白人搞的女人自己这样推理：“我可以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那么搞我的可能是白人或黑人。不过，要是搞我的是黑人，那在我面前被白人搞的那个就会看到两个黑人并迅速判断出搞她的是白人——她该已经站起来并迅速离开了。但她没有，那搞我的一定是白人。”

◎第三种情况，每个女人都在被白人搞，因此每个女人都看到两个白人。每个女人都可以用和情况二里胜者相同的思路来推理，推理过程如下：“我能看到两个白人，因此搞我的可能是白人或黑人。但如果我这边是黑人，那另外两个都能

推出（如情况二里的胜者）：‘我能看到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如果搞我的是黑人，被白人搞的女人会看到两个黑人，并立即得出结论搞她的是白人并离开。但她没这么做。那搞我的一定是白人。’但是既然没人这么做，搞我的一定不是黑人，也只能是白人。”

但这里逻辑时间出现了。如果三个女人同样聪明并同时站起来，这会使她们每一个人都陷入谁在搞她们的极端不确定性。每个女人都没法知道，另外两个站起来是否基于和她同样的推理过程，是依据在被白人搞做出的判断，还是基于她被一个黑人搞，根据情况二中胜者的推理方式做出的判断。胜者会是那个第一时间对这种犹豫不决做出正确解读，并跳转到所有人当时都在被白人搞的结论上的那个人。

对其他两个女人的安慰性奖励则是，至少她们会被搞到底。当有人注意到，故事里对男性的选择存在着政治性多元决定因素^①时，这事儿就

① overdetermination，指对某单一状况可由多个不同因素所导致，但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单独导致这一状况。政治性多元决定是由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所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骚乱就是政治性多元决定的一个例证。

有了意义：对 18 世纪中期的法国上流女性来说，选黑人做性伴侣，面上社会难容，但却是私下的秘密情人，原因是传说中的高强本领和假想中的超级阳具。因此，和白人搞，脸面虽有，实则不足；和黑人搞，性事虽足却失了脸面。然而，这个选择远比其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因为性事中，总有幻想中的注视观察着我们。这个逻辑难题的信息因而变得更加含糊不清：三个女人在被搞的同时正观察着彼此，她们不得不确定的，并非简单的“谁正在搞我，黑人还是白人？”而更可能是，“在别人的注视中，我正在被谁搞？”就好像她的真正身份，恰是在这种凝视中被确立。

关于重复的功用，来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老笑话是极好的例证，一个政客访问德国，途经一地，问向导：“这是什么城市？”向导回答“巴登—巴登”^①。政客厉声反驳：“我不是傻子，你不用告诉我两遍！”

^① Baden-Baden，德国当地的一个地名。

一个装腔作势的傻子去高档餐厅吃饭，侍者问他：“要什么开胃小菜？”^①他答道：“不，我没失业，我赚的钱足够在这儿消费。”侍者接着解释他是指开胃菜品并推荐了生火腿：“生火腿怎么样？”^②傻子答道：“我不认为这是我上次在这儿吃过的火腿。但没关系，现在让我们来一个吧——还有，请快点！”侍者为了打消他的顾虑，说：“我很期待为您效劳！”^③傻子听后驳斥：“为什么要憎恨为我服务？我会给你笔不错的小费！”然后如是种种，直到最后傻子意识到，他的法语知识实在有限，为了挽回面子，证明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决定，在晚一点离开的时候，不用法语祝那个侍者——“晚安”——因为担心可能再出错，而是用拉丁语：“当心点！”^④

大部分哲学上的对话，其状况不也是如此

① Hors d'oeuvre, 法语借词，在法语中的书面义是失业。

② Du jambon cru, 法语词，即生火腿。其中 cru 有原先的意思。

③ “J'ai hate de vous servir!” 故事中的蠢人误把 hate 当作英语的 hate, 为憎恨之意。

④ “Nota bene!”, 现代英语中多用于法律文件，强调应特别留意的条款。

吗？特别是当一个哲学家致力于去批判另一个哲学家的時候。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不就是一连串的“当心点”吗？还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等等，等等。

关于“贵族”^①的笑话，可以虚构一个真正恶心的版本，轻松胜过其他所有那些可能的恶俗表演，如家庭成员间的恶俗互动：呕吐、大便、通奸、彼此羞辱等。这个版本是：当被要求进行表演时，他们用黑格尔的思想给经理小上了一课，争论有关否定^②、扬弃^③和绝对知识^④等概念的真正意义。当受惊的经理问这个奇怪的表演叫什么时，他们狂热地答道：“一群贵族！”事实上，对布莱希特^⑤的名言“抢一家银行和建一家银行的区别是什么？”可以这么诠释：一个家庭成员拉到另一个的嘴里和一个恰当的辩证反转相比，哪一件更令人震惊？因此，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个笑

① The Aristocrats, 轻歌舞剧场表演时期就有的一个笑话，以低俗犯禁取乐，通常由独角喜剧演员表演，基本故事情节为一个家庭表演团去找星探，星探会问他们会什么？然后，全家人就开始表演，通常是即兴表演，但表演内容限定在一些下流犯禁的题材上，如谋杀、乱伦、强奸、吃大便等等。当错愕的星探问他们在干什么时，一家人就自豪地、甚至是手舞足蹈地宣布：贵族！

② Negativity,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③ Sublation,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④ Absolute meaning,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⑤ 贝尔托·布莱希特 (Brecht Bertolt, 1898—1956), 德国诗人和剧作家。

话的标题反转一下——一家专门做各种大尺度色情表演的夜总会，这家人找到夜总会的经理，表演黑格尔式的对话，当被问到这个奇怪表演的名字时，一家人亢奋高喊：“一群变态！”

一则关于耶稣的笑话，黄得恰到好处：在耶稣被捕并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前夜，他的信徒们忧心忡忡地想到耶稣还是个处男；让他死前得到点儿这方面的经验和快乐岂不是好？所以他们就派了玛利亚·抹大拉^①到耶稣休息的帐篷去勾引他。玛利亚表示乐意效劳，然后就进了帐篷。但五分钟后她尖叫着跑了出来，又惊又怒。信徒们问，哪儿不对了？她解释说：“我慢慢地脱掉衣服，张开大腿，让基督看我的‘那话儿’。他看了下，说‘多可怕的伤口！应该把它愈合！’然后就把手轻轻放上去了。”

所以警惕那些刻意要愈合别人伤口的家伙——要是人家喜欢自己的伤口咋办？如果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去直接愈合殖民主义的伤口（真正回到殖民前的状态），也会是一场噩梦：如果现在的印度人发现他们回到了殖民前，无疑也会发出和玛利亚·抹大拉同样惊恐的尖叫！

^① Mary Magdalene，基督教里的一个人物，耶稣出游的随从之一，目睹了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中世纪的时候被演绎成一个失足卖淫女，但这一形象并不为正统福音书所认可。

一则关于耶稣的好段子：在辛苦布道和神迹表演后，为了得到放松，耶稣决定去加利利海边来一个短暂休假。和他门徒比高尔夫时，出现了一个难打的球。耶稣没打好，球落到水面上去了，然后他就使出惯用的伎俩：跑到水面上去弯腰捡球。当耶稣再次尝试打这个难球时，那个门徒告诉他——这个球非常难打，只有像老虎伍兹那种人才能做到；耶稣回答说：“去他妈的，我是上帝的儿子，老虎伍兹能做到的我也能！”说完，又击一球。球再次落水，耶稣再次表演水上行走捡球。正在这时，一队美国游客经过，其中一个注意到这个情形，转头问门徒：“我的天，那家伙谁呀？以为自己是耶稣咋地？”门徒答道：“不是，那混蛋以为自己是老虎伍兹呢！”

多重身份标签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谁，包括上帝，就直接是他本尊；每个人都得有个外界认可的假身份。

基于三点，我们可以断定，耶稣来自一个犹太家庭：(1) 子承父业；(2) 他妈认为她儿子是神；(3) 他无法想象他爸妈有过性关系。

犹大其实没背叛耶稣，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一点？不管别人怎么看犹太人，犹太人都很清楚自己要卖的东西能值多少。因此，绝不会有哪个犹太人，为 30 块银币就把一个神卖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里进行着：共产主义社会需不需要钱？左派托洛茨基分子宣称共产主义将不需要钱，因为只有存在私营业主的社会才需要钱；右派布哈林分子则宣称需要钱，因为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都需要钱来调控产品贸易。最后，斯大林同志出手了，右派和左派都被否定，他宣称，真理在一个更高层面上是辩证统一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就问他，这种统一怎么样？斯大林答：“未来会有钱也会没有钱。一些人会有钱，其他人会没钱。”

“否定之否定”的关键性逆转是在一个特别阶段发生的意外变化——这种变化用一种新的且更直接的方式，暗中削弱了主体的地位和行为。关于这种变化，有个好例子：莫斯科的一次地方党代会上，彼得罗夫正在做没完没了的发言。他注意到第一排有个明显很不耐烦的男人，就问：“嘿，你，知道我刚才提到的布兰弗是谁吗？”“不知道。”男子答。“你看，你要是多来参加党的会议，听讲的时候再认真点，你就知道布兰弗是谁了！”彼得罗夫紧接着驳斥。“可是，彼得罗夫，你知道谁是安德烈耶夫吗？”男人回击。“我不知道什么安德烈耶夫。”彼得罗夫答道。

“如果你少参加点党代会，多仔细听听你家正发生什么事，你就知道安德烈耶夫是谁了，就是那个每次你没完没了做报告时，在你家搞你老婆的家伙！”男子淡然作结。

类似的意外转折，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恶搞比尔·克林顿勾引能力的笑话：克林顿和教皇死在同一天，然而，由于神界管理混乱，克林顿去了天堂，教皇去了地狱。过了几天，错误被发现，两人被要求调换过来。在连接天堂和地狱的电梯前，他俩碰面了。眼见克林顿就要离开天堂，教皇忙问：“快告诉我，纯洁无瑕的玛利亚^①还好吗？我恨不得马上见到她！”克林顿冲他笑笑：“抱歉，可她不再是纯洁无瑕的处女了。”

① Virgin Mary，即圣母玛利亚，此处直译为体现原笑话 virgin 的双关语义。

一幕场景的意义会因为主观视角的变化而彻底改变。在一则经典的苏联笑话里，勃列日涅夫死后下了地狱，然而，因为生前是大牌的领导人，他得到转一圈看看和挑房间的特权。当向导打开一扇门时，勃列日涅夫看到沙发上坐着赫鲁晓夫，正把玛丽莲·梦露放在腿上胡啃乱摸。“就这个房间吧！我也不怎么挑，”他兴奋地喊道。“别太性急，同志！这间地狱房不是给赫鲁晓夫的，是给玛丽莲·梦露的！”向导驳斥道。

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个笑话，很好地诠释了预设信念的自相矛盾。尤里·加加林，第一宇航员，在造访太空之后，受到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坚定地告诉总书记：“同志，你知道，我上天的时候，看到有上帝和天使的天堂——基督是对的！”赫鲁晓夫冲他嘀咕：“我知道，我知道，但保持沉默，别跟任何人讲！”第二个星期，加加林造访梵蒂冈，受到教皇接见，他郑重地告诉教皇：“神父，你知道，我上天的时候，发现那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天使……”“我知道，我知道，”教皇打断了他，“但保持沉默，别跟任何人讲！”

有人甚至可以用《圣经·诗篇》23：4里的段落来发展成一个黑格尔的三段论：“即使我走在死亡之谷的阴影里，我也不会畏惧任何邪灵，因为你和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第一种否定是由于主体视角的激烈翻转，如黑人说唱的版本：“即使我走在死亡之谷的阴影里，我也不会畏惧任何邪灵，因为我就是整个谷里最坏的那个混蛋！”接下来的否定之否定是通过“解构”上帝和魔鬼的对立来改变整个场景：“即使我走在死亡之谷的阴影里，我也不会畏惧任何邪灵，因为我知道，上帝和魔鬼只是形而上学的对立。”

关于性和头疼关系的笑话，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可以很好地诠释黑格尔三段论的逻辑。我们先从经典版开始：一个男人想和他老婆做爱，老婆回应“对不起，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我现在不能做！”这个由头然后被否定或反转为女权解放的版本——女人现在想做爱而可怜的男人答道：“对不起，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在否定之否定的总结阶段，整个逻辑被再次反转，这次是发展一个论点来否定原先的论点基础。“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我们做爱吧，帮我缓解一下！”而且甚至可以设想，在第二个和第三个版本间存在着一种更压抑的状况：丈夫和妻子都头疼，说好就一起简单喝杯茶。

在俄耳甫斯^①转身回望欧律狄刻^②并因此失去她之后，神安慰他——的确，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失去了她，但从现在开始，他将能从任何地方都感受到她的美丽，从空中的繁星到闪耀的晨露。俄耳甫斯迅速发现这一变故中的自恋妙处：他为欧律狄刻在他面前诗意的闪耀而欣喜若狂；简言之，他爱的不再是她，而是对她的这份爱中所呈现出的自己。

当然，对俄耳甫斯为什么要回头看并因此把事情搞砸这个永恒的问题，上述是个喜剧化的新视角。从中可以发现死亡驱动和创造力升华之间的简单联系：俄耳甫斯的回视只是个狭义上的反常行为；他是故意失去欧律狄刻，从而把她作为崇高诗意灵感的客体而重新获得。（这个想法是克

① Orpheus，古希腊神话里的音乐家、诗人、预言家。据说他的音乐可以打动一切生灵。

② Eurydice，俄耳甫斯的妻子，音乐之神阿波罗的女儿。遇毒蛇而死。俄耳甫斯奋而营救，在阴间用音乐打动了冥王哈德斯，可以带欧律狄刻回来，但条件是他必须走在妻子前面，且在两人都到达阳间之前，他不得回头望。俄耳甫斯路上生疑，回望妻子，欧律狄刻瞬间消散。后俄耳甫斯为酒神女祭司所杀，在阴间和妻子重聚。

劳斯·斯维莱特^①提出来的。) 但是否该再多想一步? 如果是欧律狄刻意识到爱人俄耳甫斯所陷入的僵局, 而故意唤他回头呢? 要是她这样想: “我知道他爱我; 但他终将是个伟大的诗人, 这是他的命, 他没法兑现和我好好厮守的承诺——那么我唯一能做的合情理的事就是牺牲自己, 唤他回头让自己消失, 这样他就能成为命定的伟大诗人了”——然后她就开始以轻咳一类的举动吸引他的注意。

① 克劳斯·斯维莱特 (Klaus Theweleit, 1942—), 德国社会学家、作家。

两个犹太朋友经过一个天主教堂，教堂外面有一个面向非天主教徒的巨大海报：“加入我们吧，接受天主教义，你将立即得到三万现金！”之后，两人开始激烈争论这个提议是不是真的。一周后，两人再次在这个教堂前相遇，其中一个很认真地跟对方说：“我还是在想，那个提议到底是不是真的？”“靠，你们这些犹太人，满脑子都是钱！”另一人高人一等地应道。

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土耳其共产主义作家帕内特·伊斯特拉蒂访问苏联，正值苏联大清洗和公审时期，一个苏维埃的卫道者试图说服他针对敌人实行暴力的必要性，引用谚语：“打不破鸡蛋就做不成煎蛋饼。”伊斯特拉蒂简洁回应：“好吧，碎鸡蛋我看到了，但你的煎蛋饼在哪？”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希腊的节俭举措，我们也应该这么说：希腊人完全有权利质疑，“好吧，为了整个欧洲，我们正在打碎鸡蛋，但你们一直说好的，我们的煎蛋饼在哪？”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反苏联的笑话开始流行，其中一个讲一个仙女找到一个捷克人，告诉他，她准备帮他实现三个愿望；捷克人马上许了第一个愿望：“中国军队应该占领我的国家一个月，然后撤离！”然后仙女问他另外两个愿望是什么，他说：“重复同样的事！让中国人反复占领我们！”仙女困惑，问他为什么要许这样奇葩的愿望，捷克人恶狠狠地咧嘴一笑：“因为每次中国人想占领我们，来回都得先经过苏联！”

同样的状况也经常适用于“女性受虐”^①，特别是在杜穆里埃^②的故事里，女主角们都沉醉于痛苦的感情：她们遵循被取代的逻辑；也就是说，为了恰当地诠释她们，一个人应该把注意力聚焦于第三主体（男性）上，当一个女人被虐待如反复“被中国军队占领”时所指向的主体。

① Feminine masochism，弗洛伊德定义的三种受虐形式之一，他认为这体现了雌性生物的本质。

② 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 1907—1989），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对基督教圣母感孕^①这个主题，有多个好理由可以说明，这是将希伯来语 *alma*（仅表示“年轻女人”）误译为“处女”：“看起来，让西方文明忍受了两千多年的、被尊崇的性压抑，仅仅是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译者没读懂希伯来文。”（哈里斯，《信仰的终结》）同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七十名“处女”在穆斯林天堂里等待殉道士也是源自一个误译：将 *hur* 直译为“美女”（*houris*），在基督教早期文本中与古兰经相关的这部分，使用的是阿拉姆语 *hur*，意思是“白葡萄干”，一种好吃的。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年轻的勇士决定自杀殉教，原因是望文生义地信了领袖的许诺：“天堂之门已经为你打开。许多黑眼睛的美丽处女在甜蜜之河对岸等着你。”“等到发现自己和暴徒同伙们已在天堂挤做一团的时候，他的七十个美女作为一把葡萄干给端了上来。”想象一下他脸上的表情。

在一个经典的波斯尼亚笑话里，一个家伙去

① *Immaculate Conception*，天主教认为，圣母玛丽亚并非交媾所生，而是其母圣安妮感上帝之灵而孕生，因此也避免了原罪，是纯洁无瑕的。

拜访他最好的朋友，发现他在家里后院打网球——阿加西、桑普拉斯，还有其他世界级名将都等在那儿，准备和他比赛。这人很吃惊，问朋友：“你以前不是网球运动员啊！怎么提高这么快？”朋友解释：“你看到我房后的水塘了没？里面有只神奇金鱼；如果你告诉她一个愿望，她就立马帮你实现！”这人赶紧跑到池塘边找金鱼，告诉她想要一整橱钱，然后就跑回家去看壁橱。等他靠近壁橱时，他发现蜂蜜从里往外滴，淌得到处都是。他很恼火，跑回去跟朋友说：“可我想要的是钱（money），不是蜜（honey）！”朋友很淡定：“哦，忘告诉你了——那鱼听力障碍，经常把愿望搞错。你难道没看出来，我这么跑来跑去有多无聊？你以为我真是要她给我办场超级网球赛？”这个故事不正体现了卡夫卡式的扭曲吗？可怜的穆斯林战士，被给了一把葡萄干，也是如出一辙。

关于贝多芬的流行钢琴曲《致爱丽丝》，有个波斯尼亚当代笑话，黄得恰到好处。取笑的是“文明的”西欧教师教化“原始的”波斯尼亚人。在一堂高中音乐史课上，女教师提出要用非传统的方式学习贝多芬，即更为创造性的方式：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想法或场景，然后对应说出贝多芬的某个作品。先有一个害羞的女孩说：“森林前有一片美丽的青翠牧场，一只鹿正从小溪里喝水……田园交响曲！”一个男孩接着说：“大革命，英雄事迹，自由……英雄交响曲！”最后，一个波斯尼亚男孩说：“一个大、粗、硬、竖着的阴茎。”“这表示什么？”被激怒的老师问。“致爱丽丝！”

这个男孩的言辞符合生殖崇拜意象逻辑，“缝合”了整个系列发言，这不是因为他明确提到了器官，而是因为他将隐喻换成转喻，用这个方式总结了系列发言：当前两个学生提供隐喻义时（如田园交响曲意指或唤起牧场和小溪的场景），波斯尼亚男孩提到的竖鸡巴并不意指或者代表爱丽丝，而是用来给她提供性满足的。（当然，额外淫秽的暗示是教师自己性饥渴，急需被满足，然后就不必用这些愚蠢的任务来骚扰她的学生了。）

圣保罗咖啡馆里有张海报，有滑稽逆转的意味，宣传词是：“一次感受特别的消遣”，实际上——他们告诉我——这是个高级妓女和潜在客户碰面的地方。虽然公众都很清楚，但这个信息并没在她们的官网上正式发布——正式说法是“此地会遇见你的夜晚佳侣”。但那里接触的过程的确比较特别：妓女们自己——绝大部分是修人文专业的大学生——挑选她们的客人。男人（潜在客户）走进来，在桌子旁找位子坐下，买杯喝的，然后等，与此同时，也是在被女人们观察。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合她口味的男人，会主动坐到他桌旁，让他请杯喝的，然后开始聊些有智商的话题，通常关于文化生活，有时甚至涉及艺术理论。如果她觉得这个男人够聪明、有魅力，她会问想不想和她上床，并告诉他价钱。这是带有扭曲女权主义特点的卖淫，如果真有女权主义这回事的话——然而，通常情况下，这种扭曲女权主义局限明显：妓女和嫖客都来自上流阶层，至少是中上阶层。

几年前，一家大型化妆品厂的防晒油宣传海报，遭到斯洛文尼亚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抗议，画报上一群被晒黑的女人身着紧身泳衣，旁边的标语是“每个都有她自己的点”。显然，这则宣传基于一个相当粗俗的双关语：标语表面上是指防晒油，为客户不同肤质提供不同防晒保护；然而，海报的整体效果是基于它明显的大男子主义读法：“每个女人都可以被拥有，只要这个男人知道她的点，如何激发她，让她发情！”弗洛伊德关于性幻想的观点是每个主体，无论男女，都有这样一个“点”，来掌控她或他的欲望：“一个女人，从后边看，在她的手上和膝盖上”是沃夫曼^①的点；一个塑像——如一个没有阴毛的女人，是罗斯金^②的点，等等。对我们察觉到这个“点”没什么好高兴的：这种察觉永远不能被主体掌控；它是怪诞的，甚至是可怕的，因为有时它“放逐”主体，在“尊严和自由面前”把她或他贬低如玩偶。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病例中的一个患者，因幼时目睹父母背侧性交，而后发展成对女人背部很有兴趣。

② 约翰·罗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和艺术评论家。

争论水刑是否是一种酷刑毫无意义：如果不是靠带来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如何与顽固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对话呢？在把“酷刑”这个词替换为“强化审讯技巧”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政治正确逻辑的一种延伸：正是这种方式，把“残废的”变成了“身体不便的”，“酷刑”变成了“强化审讯技巧”（还有，“强奸”也可以说成是“强化的引诱技巧”）。关键点在于，酷刑——国家施行的野蛮暴力——在公共语言经由政治正确逻辑转述的那一刻起，就被公众接受了，而这种转述是为了让受害人免于符号化的暴力。这两种现象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克尔凯郭尔^①的“焦虑的概念”^②里有个滑稽片段，他用反黑格尔的戏谑方式描写了西蒙·托恩爱西斯（13世纪巴黎经院神学家）是如何“认定上帝必须有义务为他提供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迹证明……这个故事版本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这样假设，这种权威质疑事实上已经让上帝对自己心里没谱了，如一个翘首以盼的君王，等公众奉他无上权力抑或虚名”。

证明上帝存在的逻辑性尝试，被克尔凯郭尔成功消解成荒诞和无意义的逻辑练习（表现此类面对真实信仰经历的学究式无知，他的套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上帝在焦虑这个场景远比克氏幽默感有趣，一个哲学家的逻辑实验很可能决定了自己的真伪，上帝对此很恐惧，因为如果哲学家的推理在现实中算数，且又求证失败，那上帝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进一步顺着克尔凯郭尔这条线推想：真正吸引他关注托恩爱西斯

①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旧译齐克果，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② *Concept of Anxiety*，发表于1844年，在他看来，焦虑是有充分自由选择却又无所适从的恐惧。

论点的，是上帝在焦虑这个亵渎神明的想法。关键是此处可与政治类比，因为克尔凯郭尔将上帝比作君王：将上帝置于哲学家的怪念头下，一如将某君王置于公众裁决的怪念头下。

但他想说明什么？难道只是我们应该拒绝自由颓废并选择绝对权威这么简单？对克尔凯郭尔而言，让这个看起来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案变复杂的，是在“道成肉身”^①这个点上（颇有些搞笑），上帝—国王变成了乞丐，一个身份卑微的普通人。由此，将基督教看成是让上帝退位这样一个悖论，岂不是更有道理？——上帝走下神坛，被一众名为圣灵^②的信徒所取代？

① Incarnation，指上帝或神在人间的肉体化身。

② Holy Spirit，基督教里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三者都代表上帝，但彼此并不兼容。

有不少小玩意儿号称可以带来超级快感，但事实上只是在重复乏味。最近流行一种男用训练器，和女用震动器是一对：一个自慰装置，样子如带电池的手电（避免我们带着到处走时尴尬）。将硬阴茎从装置开口处放入，按下按钮，这个东西就开始震动，直到使用者满足。这个产品有不同花色、尺寸和款式（有毛或者无毛，等等）模仿了所有三种主流性插入方式（嘴、阴道、肛门）。这里售卖的，仅是局部部件（性欲区），整个人体其他让人尴尬的部分都被舍弃了。我们亲密生活的基本前提正悄然被毁，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勇敢新世界？顺理成章的终极解决方案应该是，放一只女用震动棒入男用训练器，两个都打开，让这对理想伴侣享受所有欢愉。而我们，两个真实伴侣，则端坐桌旁喝茶，安然享受此刻而不费吹灰之力，欢愉的责任我们已经尽到。之后，若我们的手在饮茶时触碰，或许我们会以上床作结，在这场浪漫的真实部分，抛开所有外界超我压力，尽情享受。

一个南斯拉夫的老笑话，嘲讽警察腐败。一个警察突然回家，发现老婆裸身在床，且明显欲情高涨。警察很激动，怀疑她和情人在一起，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找这个藏起来的男人。当他弯腰床底时，妻子脸色煞白；但经过一阵简短低语，丈夫起身，面露得色，笑容可掬地说：“对不起，亲爱的，错误警报。床底没人！”而他手里正紧紧攥着几张大面值的钞票。

当那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以色列政坛的无条件支持者们，拒绝左派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时，他们的潜在用意可以由一则漫画做最好的诠释，这则漫画发表于维也纳日报《消息报》2008年7月刊：画面上是两个矮胖、纳粹模样的奥地利人，其中一个手拿一张报纸跟同伴议论道：“你看这儿，又是这样，多正当的反犹言论！又被滥用成对以色列的廉价批评了！”今日的以色列国家联盟就是如此。^[1]

几年前，在圣克鲁斯，政治正确的首都之一，在它的大学里，我被告知他们正在发明一种笑话，好笑但没有羞辱和伤害，甚至连对某人的取笑也没有，如“当一个三角碰到一个圆会发生什么？”不出所料，我马上反击：我才不关心一个三角碰到一个圆会发生什么呢；笑话的乐趣就在于必得有人被伤害、被羞辱……但如果我当时错了呢？就此错过了一种让笑话好笑的纯粹形式，一种形式远胜于其直接内容的笑话？可话说回来，性通常不也是被拿来说事，而非就事论事吗？当然，问题在于，这个形式可以单独起作用吗？还是需要“一点现实的料”，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脏话题”（性、暴力）有关的，比较实在的内容？^[2]

一个始自苏联时期的，非常愚蠢的（非政治的！）俄罗斯笑话，两个陌生人坐在一列火车的同一个车厢里，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个突然跟另一个说：“你操过狗吗？”另一个很吃惊，应道：“没——你有过？”“当然没有！那太恶心了。我就是找点话说！”^[3]

在某国，地方领导人常因品味恶俗和痴迷于性而成为黄段子里的取笑对象。（这些笑话更多是基于党内高级干部而非老百姓对基层干部的看法。）其中有个段子是讲，一个小地方的党委书记去大城市出差时，给自己买了双很贵的亮面黑皮鞋。回来后，想炫耀下皮鞋质量，所以，当他的年轻秘书给他端茶靠近桌子的时候，他就把脚伸在下边，然后告诉秘书，她内裤的颜色是蓝的（反射在他鞋面上）。第二天，调情继续，他告诉她，今天她内裤的颜色是绿的。第三天，秘书决定什么都不穿就来；看着鞋面的反射，党委书记失望地喊道：“我才刚买回来没多久，这上面就裂个大缝！”

在最后一次转换里，准确地说，党委书记看到的是“东西本身”（阴道口，没被任何内裤挡住），可他在认出之前退缩了，而仍看成该被鞋面反射出来的东西（他皮鞋亮面上的裂纹）。我们甚至可以察觉到，在书记恶俗表现下隐藏的教养：在一次温和的误认中，他宁愿做一个傻瓜也不粗鲁地说出他看到的東西。这里的转换过程是异于恋物癖的：主观预期并未在他看到最后一件东西

时停止；在他直接看到张开的阴道之前（如恋物癖的关注点），也就是说，在看到阴道缝之前，他的鞋还不是他的迷信；当无意地、出乎意料地，他看到了阴道缝，他把那条缝当作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缺陷。^[4]

一个特别残酷的、先坏消息再好消息的医学笑话，消息有好—坏—好三个部分，可以很好地诠释黑格尔三段论并包括最终“和解”。在妻子经过一个长时间且有风险的手术之后，丈夫去找医生询问结果。医生开始说：“你太太活下来了；她可能会比你活得还长。但有些后遗症：她没法控制自己的肛门肌，所以屎会不断淌出来。她阴道里也会不断有味道难闻的黄色液体流出，所以任何性生活都不能有。另外她的嘴也功能失调，吃东西时食物会从里面掉出来。”注意到丈夫表情惊恐，医生友好地拍了拍他肩膀，微笑着说：“别担心，我刚才开玩笑！没啥可担心的——她死在手术里了。”^[5]

一个精彩的黄笑话，讲一个波兰—犹太裔妻子，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很疲惫，她丈夫回家时，也很疲惫，但颇有性趣。她丈夫对她说，“我现在没法和你做爱，但我需要放松——你能给我舔舔然后把我的精液吞掉吗？那会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也太累了，没法这么做——不如你自己撸到杯子里，我明天早上喝掉。”妻子回应道。

这个妻子——所违背的，并非男性对女性的理性认识，而是对女性整体直观感受的俗念——她所提供的例子，将原本自然一体的分开，不正是一例无情使用女性的正解吗？^[6]

想起意大利语中有个说法 *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就算不是真的，想法也是好的。”从这个意义上，名人轶事，即使是编出来的，也好过那些他们真实品行的流水账，经常可以更贴切地勾勒出那些名人的核心特质——同理，如拉康所说，“真相有着小说的结构”。意大利语的这个说法，还有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下流有趣的版本，完美诠释了对符号化虚构原始神经质式的排斥：“*se non è vero, jebem ti mater!*”“*Jebem ti mater*”（读作“耶柏母提梅特，意为“我要搞你妈”）是最常用的骂街话之一；当然，这个笑话，在 *e ben trovato* 和 *jebem ti mater* 之间，有着同样的发音和音节数量，藉此产生完美的对应关系。其意思因而转向侮辱至亲来发泄愤怒，攻击别人最亲近的所属：“最好是真的——要不是真的，我就搞你妈！”这两个版本因而清晰地将两种反应证成字面上的谎言：粗暴的否认，或者“扬弃 / 升华”到“更高的”真理。用精神分析术语说，

二者的差异即前置早闭^①和符号虚实转置^②之间的差异。^[7]

-
- ① Foreclosure (Verwerfung)，拉康认为父亲的作用是将婴儿引向更广阔的符号世界，是连接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桥梁，是原始能指。当个体在发展中没能接受到这种父方作用，就是前置早闭，这也意味着该个体永远无法通往符号世界，精神世界错乱。
- ② Transubstantiation，天主教义里，圣餐里提供的面包和葡萄酒实际上是基督的血肉，反过来讲，圣餐中的一滴酒或一点面包碎屑，都有基督完整的存在。

谁才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真正作者？关于这个谜有个老笑话：“不是莎士比亚，而是有个重名的。”这就是拉康所谓“去中心的主体”；一个主体是这样与固化其符号身份的名字发生联系的：约翰·史密斯（在定义上，在其根本概念里，从来）不是约翰·史密斯，而是另外某个重名的家伙。如莎剧里的朱丽叶所知晓的，她永远不是“那个名字”——那个认为自己就是约翰·史密斯的约翰·史密斯是个精神病。^[8]

对别人（尤其是大人物）的缺点或不足，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诠释：两个朋友正在玩一个游戏，需要用一个小球去击中一个罐子。其中一个在反复踢了几次以后说：“见鬼，打偏了！”他的朋友，一个狂热的基督徒，批评道：“你怎么敢这么说！这是亵渎！上帝会拿雷劈你的！”过了一会，雷来了，但把信徒劈了个趔趄，几乎劈死他，信徒仰天大叫：“我的神！为什么劈的是我？不是那个罪人？”空中回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见鬼！打偏了！”^[9]

一个根本没法表达的观点，经常在笑话里得到变通的表达。时下中国有个笑话，是两个还在娘胎里的双胞胎兄弟的对话。其中一个和他兄弟说：“我喜欢咱爹来看我们，可他每次到最后都很粗鲁，吐我俩一身。”另一个回应说：“可不是嘛！咱叔就好得多：每次来都戴个挺好的橡胶帽，这样就不会吐到我们了。”^[10]

斯洛文尼亚的一个老笑话，学校里的一个小男生得写篇短文，题目是“只有一个妈！”，要求用恰当的个人经历来表现母子间的爱。他是这么写的：“一天我回家比往常早，因为老师病了；我看到我妈光着腩，和一个不是我爸的男人躺在床上。我妈生气地冲我喊：‘傻看什么？还不快去冰箱给我们拿两瓶冰啤酒！’我跑进厨房，打开冰箱，往里面看了看，然后冲着她卧室喊：“只有一个，妈！”

这难道不是一个加个逗号就意思全变的极品例子吗？像戏仿《白鲸记》的开头：“叫我，以实玛利！”^① 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分辨出同样的做法（他读“无事儿无理”[nihil est sine ratione]，转换口音停顿为“无是无理”），或者是符号法则里禁止感叹号的超我位移（从“不要杀！”到“不要”……“杀！”）。然而，我们应该尝试更冒险一点的诠释。儿子面对妈妈不可思议的过分欲望时，笑话演绎的是一个哈姆雷特式

① 赫尔曼·梅尔维尔发表于1851年，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整个故事几乎是用以实玛利为第一人称来描述，本书第一章第一句是：“叫我以实玛利”（Call me Ishmael）。

的僵局；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妈妈寻求躲避 / 转移欲望于一个外在的偏爱物品，就注定用那瓶啤酒，把儿子的注意力从她和一个男人赤裸在床的下流事上转移开——提这个要求传递的信息是：“你看，就算我和一个男人在床上，我想要的其他东西你仍可以带给我。我和这个男人激情四射的时候也没把你排除在外。”两瓶啤酒也代表着基本的成对标识，如拉康在“无意识信的例证”^①里提到的，两个孩子透过火车窗看到的两扇厕所门；从这个角度看，孩子的应答可以解读成在给他妈上拉康的基础课：“对不起，妈妈，但这里只有一个能指，给男人的。没有双数能指^②（是给女性准备的），双数能指是 *ur-verdraengt*，最初受压抑的。”简单说，你被抓住光着腚，你没被这个能指遮住。还有，这和一神论的基本信息有什么关系？并非去掉他者而仅剩唯一的神，而是相反，接受双数能指已经不存在且总是不存在的事实。

①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发表于1957年。拉康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小男孩和小女孩在火车的同一个车厢，火车开动经过站台厕所时，各自注意到异性的厕所门标，实际上两扇门是一样的。喻指我们都在各自的性别基础上参照异性所指进入符号世界。

② binary signifier, 是他者欲望的能指，是父之名，也是前注中父方功能的符号。

唯一的神和与之对立“最初受压抑的”之间的失衡是非常明显的差别，与那些只能浮现于无差别单一整体（“道”等）范围内的重要宇宙哲学对偶（如阴、阳等）形成鲜明对照。甚至是那些在相对次要的对偶关系上引入平衡对偶的尝试，如咖啡吧里随处可见的，人造甜味剂的红、蓝小袋，不也是为性别差异提供对称标识的绝望努力吗（蓝色“男性”袋、红色“女性”袋）？性别差异成为此类对偶的终极所指不是此处的要点，要点在于，不断增多的对偶标识，是一种尝试弥补二元对偶标识缺失的企图，这会直接体现出性别差异。^[11]

为了更好地把握无即是有这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辩证法笑话，来自刘别谦^①的妮诺契卡：男主角走进咖啡馆，点了一杯不加奶油的咖啡。服务生回应：“对不起，我们的奶油用光了。我能给您来杯不加奶的吗？”这两种情形，客人喝到的都是不加东西的咖啡，但这杯纯咖啡在两种情形下代表着不同的不加东西，一种是不加奶油，另一种是不加奶。（类似地，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国家，既不要没有共产主义的民主，也不要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差别化逻辑，即缺位本身也有一种积极的存在——南斯拉夫关于黑山人（在前南斯拉夫，从黑山来的会被污蔑为懒汉）的一个老笑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悖论：为什么一个黑山人临睡前床头要放两个杯子，一个装满水，一个空的？因为他太懒了，所以要提前想到，在夜里他可能会口渴。这个笑话的点在于，缺位本身也被当成一种积极的存在：仅有一杯倒满的水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这个懒汉不口渴，他就干脆不需要它——不

^① 刘别谦（Ernst Lubitsch, 1892—1947），德裔美国电影导演。

口渴这个事实本身也需要用空杯子标记一下，即不需要水这个事实被物化在空杯子的空里。这笑话还有个政治版的：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一个顾客走进商店问：“你们这儿可能没黄油吧，或者你们有？”店员答道：“对不起，我们是没有卫生纸的那家，街对过那家是没有黄油的！”^[12]

相类似的还有，相传赫斯特^①问他旗下报纸的一个编辑，为什么不去享受他早该享有的假期？编辑回答说：“我担心走了以后，这儿会陷入混乱——可我更担心，如果我走了，这里一切正常，那就说明这儿根本就不需要我！”一个特定的负面选择（如没有假期，不再看一遍电影）正说反说都能成立；但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两种回答的非对称性上，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上面的对话是如下两种回答，这种非对称性就会清晰地表现出来：第一种，是明显（消极的）反应，（我不喜欢这个电影；我怕我休假一切会乱套）；之后，当这种回答没达到预期效果时，再给出相反的（积极的）理由，（我喜欢这个电影；没有我一切会很顺利），这带来的结果更差。无疑，我们可以将赫斯特编辑的双重回答重构成拉宾诺维奇式^②的笑话：“为什么不去休假，你应得的！”“我不想去，

① 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美国报纸发行人。

② 拉宾诺维奇 (Rabinovitch)，前苏联时期的学者，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而闻名。

理由有二。第一个是担心我休假时一切会乱套。”“可你完全错了；你会发现，你不在这儿时，一切都会如常。”“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理由。”^[13]

还有一部绝对值得一提、跟咖啡有关的流行电影，反映英国工人阶级的戏剧《奏出新希望》(*Brassed Off*)。男主角送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回家，在她公寓门口，女的问他：“想进来喝杯咖啡吗？”男主角的回答是——“有点儿问题——我不喝咖啡”——女士回以微笑：“没关系——我也根本没有咖啡。”汹涌、露骨的情欲蕴藏于她的答复方式，通过一个双重否定，反复发出令人难为情的、直接的性邀请但根本就没提到性：她先邀请他喝咖啡，然后又承认她没有咖啡，她没有取消她的邀请，她只是把邀请说得更清楚，喝咖啡是个替身（或者借口），邀请本身没有区别，是为了性。顺着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想象，在2002年年末，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已经就绪时，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对话：“跟我们一起打伊拉克，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问题吧！”欧洲回应：“可我们没有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备！”“没关系；伊拉克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拉姆斯菲尔德回道。^[14]

一个关于做饭的笑话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任何人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做好一锅汤：备齐所有食材，菜切好，烧开水，把食材都放进去，小火煨半个小时，偶尔搅拌一下；45分钟后，你发现汤没什么味也没法喝，倒掉它，打开一罐好的汤罐头，放进微波炉，快速热一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的做汤方式。”^[15]

我们在这儿提到的上帝，更像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笑话里的那个。一个能干的苏联共产主义宣传家死后，发觉身在地狱，迅速说服守卫，离开地狱去了天堂。当撒旦发现他不在时，赶紧去找上帝要人。然而，撒旦刚张嘴跟上帝打了个招呼：“我的主……”上帝就打断了他：“第一，我不是主，而是一个同志；第二，你脑子有病吧？和一个虚构的生物说话——我根本就不！存！在！第三，尽量简短，不然赶不上我的党小组会了。”

这就是今日极左所需要的上帝：一个“早就变成了人”的上帝——我们中的一个同志，同时被两种社会遗弃身份所折磨——不仅“不存在”，还得自己知道这事，接受他被抹去的事实，完全忽略那些维系圣灵（党派、解放组织）信徒的爱。^[16]

德里达有个钟爱的老笑话，关于犹太人的。犹太教堂里，一群犹太人在公开供认自己在神眼中的卑微。一个拉比先站起来说：“哦，神啊，我知道我没用，我什么都不是！”他结束后，一个富商接着站起来，捶着胸喊：“哦，上帝啊，我也没用，痴迷于物质。我什么都不是！”富商结束后，一个穷犹太人站起来宣告：“哦，上帝啊，我什么都不是！”富商踢了踢拉比，很不高兴地哼哼着：“太侮辱人了！那家伙谁啊？也敢说自己什么都不是！”^[17]

关于黑格尔综合法的“神奇技巧”，最终只有两种方式来解释，在结构上类似于“先坏消息再好消息”的庸医笑话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所谓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只是看待的角度不同。（“坏消息是我们发现你得了老年痴呆。好消息也是这个：因为你有老年痴呆，等你回到家，你就把这个坏消息忘了。”）而另一个版本是：好消息的确是好，但是和另外的主体相关（“坏消息是你有晚期癌，一个月就会死。好消息是：看到那边那个年轻、漂亮的护士了？我已经勾搭她一个月了；昨天她终于同意了，我俩像疯子一样整整干了一宿。”）真正的黑格尔“综合法”是这两种选项的综合：好消息就是坏消息——但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转换不同的视角（从那只死的鸟转换成另一只替代它的；从癌患缠身的病人到快乐的医生；从基督作为个体到成为信徒们的共有）。^[18]

变奏

◎关于老年痴呆的那个老笑话，设想一下里

面的逻辑（“坏消息是我们发现你得了老年痴呆。好消息也是这个：因为你有老年痴呆，等你回到家，你就把这个坏消息忘了。”）在这儿也适用，在创伤后人格丧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病人之前的人格被毁掉了，对其遭受痛苦的恰当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消失了呢？^[19]

◎关于好消息 / 坏消息的医生笑话，有一个坏到头的终极版本；以好消息开场，然而，这消息是极为不祥的，因而也不需要再加上坏消息：“医生：首先是好消息，我们非常确定，你的病不是忧郁症。”这儿就不需要再提坏消息了。（另一个版本：“医生：我有些好消息，还有些坏消息。病人：好消息是什么？医生：好消息是你的名字很快就在全球家喻户晓了——一种病以你的名字命名了！”这是个非辩证的短路吗？还是个更贴切的辩证开头，直接就把自己给否了？类似这个笑话的东西出现在黑格尔逻辑的开头，并非通往反面，而是一上来就自我摧毁。

一个老笑话，丈夫比平日下班早，回家发现老婆跟别的男人在床上。惊讶的妻子嚷道：“为什么早回来了？”丈夫恼怒地问：“你和这男的在床上干什么？”“我先问的你——别想转移话题！”妻子淡定应道。^[20]

“民粹主义”^①因而被定义成一种负面的现象，一种基于否定甚至是暗里自认无能的现象。我们都知道那个老笑话，一个人在路灯下面找他丢了的钥匙；当有人问他丢哪儿了，他承认丢在一个黑暗角落里了。那为什么在这儿找？因为这里看得更清楚。民粹主义里也总上演类似的戏码。跑到犹太人的麻烦里找原因，因为相比那些复杂的社会进程，这些更容易分辨。^[21]

① Populism，一个长期缺乏准确定义的学术术语，通常指代表普罗大众利益和意愿的诉求，但左派、右派、中间派的表现形式都有，因此更像是一种政治修辞。

我对巴迪欧^①产生疑问的原因是，我认为那个概念有问题，即一个人可以过度“强化”一个真理：这几乎可以适用拉康所引用的笑话里的逻辑：“我未婚妻约会从不迟到，因为当她迟到的时候，她就不是我未婚妻了。”真理永远不能被强化，当真理的精确性作用成一种过度执行时，我们所涉及的就不再是真理，不再是真理事件的真实性。^[22]

变奏

◎ “我未婚妻约会从不迟到，因为当她迟到的时候，她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和这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有点像的一个版本是：如果你爱上帝，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因为当你做了邪恶的事，这行为本身就证明你不是真的爱上帝。^[23]

◎ 有一个关于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故事（可能是伪造的）：在上

① 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个世纪 50 年代去拜访苏联之前，他写信给他的反共产主义朋友悉尼·胡克：“别担心，我不会被苏联迷惑，回来后宣称他们有社会主义！”胡克迅即回信：“这正是我担心的——当你回来，你会宣称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胡克所担心的，是对这个概念纯粹性的天真辩解：如果出错是由于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辩解不会否定概念本身；而只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正确地执行这个概念。我们难道没察觉到，在市场原教旨主义^①者那里存在着同样的天真吗？最近的电视辩论中，当居伊·索尔曼宣称资本主义必须和民主并举时，我忍不住问了他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今日的某国该做何解？”他反击：“某国没有资本主义！”对狂热的资本主义拥护者索尔曼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非民主的，就简单意味着这个国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者而是在实践中严重走了样，这实质上 and 民主的斯大林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形式是一样的。

此中的潜在错误不难识别——和笑话“我未婚妻约会从不迟到，因为当她迟到的时候，她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里的错误一样。这就是今

^① 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

日的市场辩护者，以一种前所未闻的意识形态绑架，解释 2008 年的危机：自由市场不是导致失败的原因，过度管制才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被福利国家^①所掌控的。

◎ “我未婚妻约会从不迟到，因为当她迟到时，她就不再是我未婚妻了。”这个笑话更残酷的版本是——人民永远支持党，因为人民中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都自动将自己排除在人民之外了。^[24]

◎ 顺带着，让我们关注一下“怀疑论难题”^②和拉康常用的笑话：“我未婚妻约会从不迟到，因为当她迟到的时候，她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结构间的同源性——“在应用一条规则时，我从来不犯错，因为我所做的定义了真正的规则。”^[25]

① 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是一个政治学概念。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统治的一种方法。

② 即是否有客观的存在？如果有，能否意识到？如果能意识，能否表达？

虽然欧洲“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已经沦为一个后现代失落对象的怀旧把戏，我们中仍有些人会回忆起那个著名的波兰反共产主义笑话，源自欧洲“真正存在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所有之前生产模式伟大成就的集大成：从没有阶级的部落社会那里取了原始主义，从亚洲生产模式那里取了独裁专制，从古代时期^①那里取了奴隶制，从封建主义那里取了领主对农奴的社会统治，从资本主义那里取了剥削，最后从社会主义那里取了名字。”犹太教的反犹特征不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吗？从那些大资本家那里取了他们的财富和社会控制权，从享乐主义者那里取了性解放，从商业流行文化和黄色新闻那里取了低俗，从社会底层那里取了污秽和臭气，从知识分子那里取了腐朽的诡辩，从犹太教那里取了名字。^[26]

① 主要指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并不是说在政治中投入更多热情的号召于其自身无意义（当代左翼当然需要更多的热情）；问题在于这和拉康所引用的某个笑话太相似：一位医生的朋友想从他那儿得到免费的医疗建议，医生不情愿，故而在给朋友作了检查后坚定地说：“你需要看医生。”^[27]

几年前，一则有趣的啤酒广告出现在英国电视上。广告的第一部分源自一个著名的仙女传说：一个女孩沿着一条小溪走，看到一只青蛙，蹲下轻轻拿起来，吻了一下；不出所料，青蛙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美男。然而，故事没有就此结束：美男贪婪地望着女孩，把她拉过来，亲吻了她——然后女孩变成了一瓶啤酒，被男人得意地拿在手上。对女人而言，重点在于她的爱和影响（通过那个吻）把青蛙变成了美男，一个完整的爷们儿；对男人而言，则是把女人变成了一个偏爱的物件，引起他欲望的原因。由于这种非对称性，这里没有性的联系：要么是女孩和青蛙，要么是男孩和啤酒。我们永远无法看到的，是美女帅哥的正常搭配：这一假想搭配的虚幻呈现会是一个青蛙拥抱啤酒的场景——一幅不和谐的画面，并非体现和谐的性别关系，而是显而易见的荒诞不搭。（当然，此处显见的女性主义视角可能是，女性在她们日常的爱之体验中，更多见识到相反的东西：一个女人亲吻了一个美男，但当过分靠近时，为时已晚，她发现他实际上是一只青蛙。）虚幻通过所带有的过度识别操控我们，这个广告展

示了削弱这种操控的可能性：多种虚幻的不和谐元素，在同一个空间内，同时拥抱在一起。也就是说，两个主体各自沉浸于自己的主观化想象中——女孩把青蛙幻想成一个美男，男人把女孩想象成一瓶真正的啤酒。现代艺术和写作所反对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物化的主观的”潜在幻想，即永远无法想象两个主体，呈现一幅类似于玛格丽特风格的画，一只青蛙拥抱着一瓶啤酒，题为“男人和女人”或者“理想的一对”。^[28]

一个粗俗的笑话，讲一个傻子第一次性交，女的不得不明确告诉他该怎么弄：“看到我两腿间的这个洞了吧？把它放在里面。现在往里深推。现在往外拔。推进去，拔出来，推进去，拔出来……”“现在停一分钟，”傻子打断她，“你先自己想明白！到底是进去还是出来？”^[29]

有一个南斯拉夫的猜谜笑话：“教皇和喇叭的区别是什么？教皇来自罗马，喇叭是用锡做的。那来自罗马的教皇和用锡做的喇叭的区别是什么？锡做的喇叭可以来自罗马，但罗马来的教皇不能用锡做。”用类似的方式，我们应该把巴黎人的涂鸦笑话搞成加强版：“‘上帝死了’和‘尼采死了’的区别是什么？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上帝说的‘尼采死了’。那说了‘上帝死了’的尼采和说了‘尼采死了’的上帝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说了‘上帝死了’的尼采，没死，而说了‘尼采死了’的上帝，自己死了。”要取得的贴切讽刺效果，关键不在于异中求同，而在于同中求异；这就是为什么，如阿伦卡·祖潘契奇^①所指出的，上述笑话的唯物主义者版本（因而也是贴切的讽刺）大概会像是：“上帝死了！然后，事实上，我也感觉不太好……”^[30]

① 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1966—），女，斯洛文尼亚哲学家，主要研究精神分析和大陆哲学。

关于马克斯兄弟^①的系列笑话（“难怪你看着像 X，因为你就是 X！”；“这个男人可能看着像傻子，行为也像傻子，但你别被表象骗了——他实际就是个傻子！”），对同一性和相似性的矛盾辩证做了最好的例证，当我们介绍这些时，克隆的神异难测变清楚了。让我们以父母钟爱的唯一子女为例，孩子死了，父母决定克隆他以让他复生：这一结果的怪异性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新孩子有着所有死去孩子的特征，但这些真实的相似点让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即使他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他也不是原来那个，因此他是个残酷的笑料，一个令人惊悚的骗子——并非失去的儿子，而是个被褻渎的副本，这个副本的存在让我们无法不记起马克斯兄弟在《歌剧院之夜》中的老段子：“关于你的每件事都让我想到你——你的眼，你的喉，你的唇……你的一切，除了你！”^[31]

① 美国经典喜剧团体，是 20 世纪 30 年代喜剧电影界最成功的喜剧团体之一，热衷于塑造癫狂或装傻充愣的人物，表现荒诞不经的内容。

几十年来，一个经典笑话一直在拉康分子^①间流传，这个笑话例证了他人知识的关键作用：一个男的认为自己是个谷粒，被送到精神病院后，那里的医生都竭尽所能地让他相信，他不是个谷粒，他是个男人；然而，当他被治愈（即被说服不是谷粒而是人）并被准许离开精神病院后，他立马又回来了，他很害怕，浑身颤抖——门外有一只鸡，他害怕鸡会吃掉他。“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医生说，“你很清楚你不是个谷粒而是个男人。”“我当然知道，”病人答道，“但那只鸡知道吗？”

这笑话里有精神分析治疗的真正关键所在：仅让病人确信那些他们无意识的症状事实是不够的；无意识本身也必须被用来推测这一事实。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也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中产阶级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课，在课堂上老师教了他商品拜物教。课后，他回去找他老师抱怨，他仍是商品拜物教的受害者。

老师告诉他，“但现在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

^① Lacanians，研究和信奉拉康理论的人。

事了，商品只是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它们自身没有任何魔力！”学生应道：“这些我当然都知道，但我打交道的那些商品看起来不知道！”这就是拉康主张的要点所在，唯物主义的真正规则不是“上帝不存在”而是“上帝是无意识的”^[32]。

变奏

◎这，至少像是，当下的主流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给自身冠以“后意识形态”的名号。尼尔斯·波尔^①，巧妙回答了爱因斯坦“上帝不玩骰子”的问题（“别告诉上帝该做什么！”），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例子，来表现一个为拜物狂所鄙弃的观念在意识形态中如何起作用：有拜访者在他家门前发现了马蹄铁，很吃惊，跟波尔说，这东西能带来好运是迷信。波尔的反击是：“我也不信这个；我把它放这儿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即使不信，它还是会起作用。”^[33]

◎所以，再次重申，真正的任务不是说服故

① 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1885—1962），丹麦著名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在量子理论和原子结构方面有卓越贡献。

事中的主角，而是那只鸡，还有那些商品：不是改变我们谈论商品的方式，而是改变那些商品相互谈论的方式。祖潘契奇对此有透彻的论述，他还虚构了一个指向上帝本人的精彩案例：“在一个民智开启的社会，或者说，革命恐怖时期，一个男人因为信上帝被投牢。通过各种方式，但最主要的是通过一种启蒙式的解释，给他灌输上帝不存在的知识。被释放后，男子又跑回来，解释他是多么惶恐，害怕受到上帝的惩罚。当然，他已知道上帝不存在了，可是，上帝也知道吗？”

从这种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时代或许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信神：我们所有人都已准备好纵身于彻底的怀疑，愤世冷漠，“无动于衷地”剥削他人，打烂所有的道德藩篱，操练极端的性行为，等等。——这一切为沉默的意识所守护，大他者^①则对此一无所知。^[34]

◎在总统铁托的最后几年，他实质上已经成了笑话里的那只鸡：根据一些档案和回忆录的显

① the big Other，拉康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大他者是一种由语言和言说话语构成的象征性他者，是直接主体之外的另一个“自我”，是主体无意识的反映。是夹在个体之间的一个神秘的、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X。

示，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围绕铁托的领导层就已经意识到，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是个灾难；然而，鉴于铁托快死了，领导层做了个集体决定，将经济危机的爆发推迟到铁托死的时候——代价则是，在铁托的最后几年里，南斯拉夫的外债迅猛增长，彼时的南斯拉夫，按希区柯克《惊魂记》里那个富有的银行客户的话来说，是在用钱来收买不幸。1980 年，当铁托最终死去时，经济危机爆发了，导致正常的生活水准一下子下降了 40%，种族关系紧张，到最后，演变成内战和种族战争，毁掉了这个国家——错失了那个可以应对危机的时间点。有人因而可以这样说，给南斯拉夫棺材钉最后一个钉子的，源自它领导圈子的极品努力：维护其领导人的无知，让他所见皆欢。

为什么那些“在……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笑话，在不同被否认时最有效，这就是原因，如：“玩具火车和女人的胸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都是为孩子准备的，但玩得最多的是成年男性。”^[35]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写过的唯一一个笑话——即使不算笑话，也是某种讽刺——是他讽刺拉康的蹩脚警句：“那个心理分析师自己才需要一个心理分析师。”（出自写给梅达特·鲍斯^①的一封信）^[36]

① 梅达特·鲍斯（Medard Boss，1903—1990），20世纪瑞士杰出的心理治疗家和心理学家，存在分析学的创始人之一。

既然这个笑话的基本反转内含于这一连串的表面例外里（那个抱怨别人的病人他自己就快死了），因此，笑话的“否定”版本则正相反，最终的反转排除于这些例外，也就是说，从那个例外中抽离出来，将自身定位成例外的例外。如在一个近期的波斯笑话里，法拉（谚语里常用的妻子名字）跟一个医生抱怨，她的丈夫穆约，每天晚上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和她做爱，因此，虽然卧室漆黑一片，她仍然睡眠不足——他总是不断地跳到她身上。好心的医生建议她使用休克疗法：她应该放一盏明灯在她的床侧，当她实在累得不行的时候，她可以突然开灯照穆约的脸；这个突然的刺激肯定会冷却他过度的热情。当天晚上，经过几个小时的做爱之后，法拉的确照着建议做了——然后发现是海斯，穆约的一个同事。她很吃惊，问：“可你在这儿做什么？我丈夫穆约呢？”尴尬的海斯答：“嗯，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门口向那些排队的人收钱。”此处的第三个术语是某种和笑话有关的“无限判断”，即同

义赘述^①成为极端的矛盾，如一则轶事里，一个男人老是跟他的医生抱怨，哪怕别人不在场时，也经常听到别人的声音。医生回应：“真的吗？为了让我理解这种幻觉，你能否跟我描述一下，通常在什么环境下，你会听到那些没和你在一起的人的声音呢？”“好吧，最经常的是我打电话的时候。”^[37]

① Tautology，又称为永真式，重言式，逻辑学术语，给定一命题公式，无论对分量作怎样的指派，其对应的永为真值。不管它的部件的真值而总是为假的陈述叫作矛盾。

通过一个特别的疾病笑话，这一点呈现得更清楚。一个病人住在一个很大的病房里，里面住了很多病人，这个病人跟医生抱怨，病房里其他病人发出的噪音此起彼伏，搞得他快发疯了。医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那些病人都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不能阻止他们表达自己的绝望。这个抱怨的病人回应：“为什么不把那些快死的病人单独放一个病房？”“这间就是！”医生慢条斯理地随口应道。^[38]

还有一只水壶是这本小册子关注的主题——弗洛伊德在笑话里提到的那只，为了阐述那些梦境的奇怪逻辑：（1）我从来没跟你借过水壶；（2）我还你时水壶没破；（3）我从你那儿拿到时，水壶就已经破了。如此一种列举，所涉论点都不一致，反而证实了其所极力否认的东西——我还了你一个破水壶。2003年初进攻伊拉克的借口上，不也体现了这种不一致吗？（1）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了“当下明确的危险”，不仅对其邻国和以色列，对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也是。（2）2003年，负责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大卫·凯，不得不承认尚未找到类似武器（在超过一千个美国专家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寻找之后），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人提出了新的借口：即使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也参与了基地组织的“9·11事件”恐怖袭击，因此他应该受到惩罚，作为替“9·11事件”进行正义复仇的一部分，也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恐怖袭击。（3）然而，再一次地，2003年9月，就连布什也得承认：“我们没有得到证据，萨达姆·侯赛因参与了‘9·11事

件’恐怖袭击。”那么，在做了这个困难的让步之后，面对超过70%的美国民众认为伊拉克的领导人个人参与了“9·11事件”恐怖袭击的民意调查结果，接下来该怎么做？有人找到了新的借口：即使没有和基地组织有来往的证据，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也是一个无情的独裁政权，对邻国构成威胁，是其本国人民的灾难，仅这一事实就足成理由去推翻他了。还是这个问题，要发动攻击，理由还不多得是。

有趣的是，凯自己提供了三种说法，解释为什么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 武器就在伊拉克，但萨达姆是“骗子大师”，把武器藏得太好了；(2) 武器没在伊拉克，因为战争开始之前，萨达姆就把武器转移走了；(3) 萨达姆从来就没有这些武器，只是在虚张声势佯装强大。（而且，作为一种好奇心，此处有一个额外古怪的反转：萨达姆的科学家们一直在骗他，仅仅是因为太害怕告诉他，其实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还有，顺带说一下，战争的反对者也在重复同样不一致的逻辑：(1) 真正的目的全部在于控制石油和维护美国的霸权——真正欺凌他国的恶棍国家是美国自己；(2) 即使不是关于石油和霸权，且进攻的理由是合理的，出于萨达姆是个刽子手

和酷刑狂，以及他的政权是个灾星，进攻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只会掀起新一轮的反美恐怖大潮；(3) 即使成功了，推翻萨达姆的这种攻击也花钱太多了，把这些钱花在其他方面效果会更好。^[39]

变奏

◎弗洛伊德为了诠释奇怪梦境所引用的笑话，为此处起作用的奇怪逻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注脚：(1) 我从来没跟你借过一个水壶；(2) 我还给你的是没破的水壶；(3) 我从你那儿拿走时，水壶已经破了。这样一种列举，所涉论点都不一致，通过否认承认了本来所极力否认的东西——我还了你一个破水壶。这种不一致不也凸显了激进的伊斯兰教徒回应大屠杀的态度吗？(1) 大屠杀没发生过。(2) 大屠杀发生了，但那些犹太人活该。(3) 那些犹太人不活该，但因为他们用纳粹对付他们的方式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失去了抱怨的权利。^[40]

托尼·布莱尔在他执政早期，喜欢改编巨蟒剧团^①的《布莱恩的一生》里面的经典笑话（“好吧，但除了下水道设施、医药、教育、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设施、道路、淡水系统和公众健康，罗马人还给我们留下了点儿什么？”），来嘲讽针对他的批评者：“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确，他们让社会更安全，他们为医疗和教育做了很多，等等。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他们仍背叛了社会主义。”^[41]

^① Monty Python，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走红的喜剧团体。

诠释这种模棱两可的最好例证，大概是，在美国可以买到的一种巧克力通便剂，上面自相矛盾的指令：“你便秘吗？多吃点这种巧克力！”也就是说，吃的就是引起便秘的玩意。我们难道没发现，理查德·瓦格纳^①在《帕西法尔》^②中的著名台词“只有带来伤口的矛可以治愈这伤口”，不也是个古怪的版本吗？还有，真正无限制消费（在它所有的主要形式上：毒品、性自由、吸烟）已经成为主要危险的事实，难道不正是这种强权主导立场的反证吗？对抗这些危险是现今“生命政治”的主要投资项目之一。费劲得到的解决方案不过是巧克力通便剂悖论的翻版。主打方案是“安全性行为”——这个术语让人体会到那句老话的妙处，实话讲：“戴套做爱不就是在穿着雨衣洗澡吗？”最终的目标大概是，顺着没有咖啡因的咖啡的路子，发明“没有鸦片的鸦片”：无怪乎大麻在那些想把它合法化的自由主义者那儿如此流行——它已经是某种“没有鸦片的鸦片”了。^[42]

①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② 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

下面的笑话，有这样一个真理要素，一个基督徒女孩向圣母玛利亚所做的理想祈祷是：“请您让那些怀孕的都无罪，让我有罪但别怀孕。”——在基督教不近人情的运行下，宗教，实质上是作为一道安全符被召唤，准予我们免于惩罚地享受生活。^[43]

在下面这个笑话里，基督实际上相当于笑话里的那个儿子：一个拉比很绝望，去找上帝，问应该怎样对付已让他非常失望的坏儿子；上帝冷静地回道：“和我一样：写本《新约》！”^[44]

以这样一种方式，上帝走下神坛，牵涉人世，步入人群，显现在一个东德的经典笑话中。尼克松、勃烈日涅夫和昂纳克一起见了上帝，询问他们国家的未来。对尼克松，上帝说：“到 2000 年，美国会变成共产主义！”尼克松转身而泣；对勃烈日涅夫，上帝说：“到 2000 年，苏联会被中国统治！”勃烈日涅夫也转身而泣；最后，昂纳克问“那我深爱的东德会怎样？”上帝转身而泣。

这儿还有个终极版：三个俄罗斯人被关在卢斯卡杨监狱的同一个牢房里，都是政治犯。相互认识的时候，第一个说：“我因为反对波波夫给判了五年。”第二个说：“啊，但后来党的路线变了，我因为支持波波夫给判了十年。”第三个最后说：“我被判终身监禁，我就是波波夫。”^[45]

改编自《约翰福音》(8 : 1-11) 的基督教笑话也消解了意义，耶稣对那些想拿石头砸那个通奸女的人说：“让你们中那个没有罪的，先来扔第一块石头！”话音未落，他就被一块石头砸中了，忙回头嚷：“妈！我不是让你待在家里嘛！”^[46]

在他书中的笑话里，弗洛伊德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介绍人试图说服一个年轻人娶他推荐的女人；他的策略是把每一个缺点都转换成某种值得赞美的东西。当人家说“这个女人太丑了！”他就回答，“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她会和别人偷情。”“她很穷！”“那她就会习惯不花你太多钱！”等等，直到最后，人家提出一项他根本没法用这种方式来转换的缺点，他爆发了，“那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完人？就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

从这个笑话里，是否也有可能察觉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化潜在结构？“商店里没有足够的肉和食物！”“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吃得太胖和得心脏病！”“好看的电影、戏剧和书都太少！”“这不正好让你加强社交，多跟朋友和邻里交往？”“秘密警察完全操控着我的生活！”“所以你就可以放松下来，过安全无忧的生活！”等等，直到……“但附近的工厂把空气污染得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都得了危及生命的肺病！”“你还想怎样？没有哪个体制是没有毛病的！”^[47]

变奏

◎一个苏联的老笑话，一个顾客到银行表示想存 100 卢布，但担心存款的安全。银行职员告诉他，银行会保证存款安全，但顾客问：“万一银行倒了呢？”银行职员告诉他，中央银行也会为所有的地方银行和它们的存款提供担保。顾客继续怀疑：那万一中央银行也倒闭了呢？银行职员回应：“那么苏联政府会担保所有的存款！”顾客仍然不放心，把风险提到了最高：“那万一苏联自己也倒了呢？”听到这儿，银行职员爆发了：“能赶上苏联消失这么精彩的事！你别告诉我你连这 100 破卢布都舍不得！”

有没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重述基督教的最初故事？即，作为一个笑话，在结尾做意想不到的反转。一个信徒抱怨着，“我以前被许诺与上帝相通，蒙神恩典，可现在我孑然一身，被神抛弃，穷困煎熬，只有悲惨一死在等着我！”神旋即发声应他，“你看，现在你就是那个实际和上帝同在的人——和救世主一起绑在十字架上受苦！”^[48]

回想起的这个笑话完美诠释了黑格尔著名的（也是声名狼藉的）三段论逻辑：三个朋友在酒吧喝酒；第一个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在旅行社，我想说‘一张去匹兹堡的票！’可我说的是‘一张去兹匹堡的票！’”第二个人应道：“那不算什么！早饭时，我想和我老婆说‘亲爱的，能把糖递给我吗？’可我说的是‘你这个婊子，你毁了我全部的生活！’”第三个总结道，“还是先听听我身上发生的事吧。攒了一夜的勇气，我打算在早饭的时候，对我老婆说你和你老婆说过的那些话，可最终我说出来的是，‘亲爱的，能把糖递给我吗？’”^[49]

一则黑格尔式的滑稽插曲：傻的和更傻的

有多少人注意到丹·奎尔^①和乔治·布什^②无意间实践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想我们已经充分见识了奎尔在20年前的表现，但和布什相比，他还是个聪明的。对于奎尔把“土豆”拼成“potatoe”，我自己必须承认，这对我而言，一直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正确：“potatoe”更接近于洪堡^③所谓的真正的“内在形式”^④，对土豆而言。（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觉得布什最近用“希腊学家们”[Grecian]代替“希腊人”[Greeks]，也有某种恰当的相似性：“和希腊学家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希腊学家们”听起来似乎更有尊严，类似于用“汝乃”来代替“你是”，因为“希腊人[greek]”听起来太像是“极客[geek]”——我

① 丹·奎尔（Dan Quayle, 1947—），前美国副总统。

② 乔治·布什（George Bush, 1946—），前美国总统。

③ 洪堡（Humboldt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

④ Inner form, 洪堡认为，一个语句的各部分构成间的关系，反映出这个语者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语句成分间的关系模式，就是语言的内部形式。

们高贵的西方文明的奠基者难道真的只是一帮极客吗？)

那么，布什又如何与奎尔对比呢？布什的这些口误，是像奎尔，已经达到马克斯兄弟水准的超级口误（“难怪你让我想起伊曼纽尔·拉维利，因为你就是伊曼纽尔·拉维利！”），还是技巧不逊于“高德温语录”，即那个有传奇色彩的好莱坞制片人山姆·高德温的警句（从“一个口头协定还抵不上写它的那张纸！”到臭名昭著的“包括我在外！”）？绝大部分布什和奎尔的口误都遵循法语里所谓常识（*lapalissades*）的基本规则，即对虚构人物拉·派里斯先生显而易见的特征进行重复赘述，如“在他死之前的一个小时，拉·派里斯先生还百分百地活着。”实际上，派里斯式的妙语“我们为什么不把城市建在乡下，那里空气不是更好？”很像共和党生态政策的一个简要规划，经由布什的惯用套路完美诠释为：“我知道人类和鱼可以和平共处。”

这儿还有些这种类型的口误，出自布什和奎尔的：“如果我们没成功，我们就承担了失败的风险”；“低投票率意味着更少的人参加选举”；“对国家航空航天局而言，太空仍是一个高优先级的项目。”在对纯粹的同义赘述以因果解释方式进行

强调时，这些常识还稍微有趣一点；来看下面奎尔的口误：“当我被问到谁在洛杉矶制造了暴乱和屠杀？我的回答简单而直接：谁应该因暴乱受到谴责？那些暴乱分子应该受到谴责。谁应该因屠杀受到谴责？那些杀人犯应该受到谴责。”（当然，这个同义赘述里有个隐含的保守党政治逻辑，也就是说，这里的引述有个背后的隐含否定：不要去找社会环境的“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当下这些作乱的该负全部责任。）以一种奇怪的黑格尔式表达，事情甚至变得更有趣了，奎尔通过对立概念和其实际例证，推翻了两之间的一致关系：“不是污染伤害了环境，是我们空气和水中的杂质造成的。”

然而布什没法沿着奎尔的这个路子走，他常用的，可以赶上奎尔的口误方式是，在自相关的认知性自我关系的辩证层面上，提出一个概念性对立。回想一下他是如何将一个特有的对立置于不可逆和可逆之间作为反转的：“我相信我们身处更加自由和民主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中——但那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并不是事情是可逆的或不可逆的那么简单：一种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形势是可以变成可逆转形势的。”这里还有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反身性：“未来会是更好的明天。”

奎尔在这儿并非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其要点在于试图宣称明天会更好：在近期的未来（明天），对我们而言，未来自己会更清晰可见。布什在他的陈述里不也复制了一模一样的结构吗？“我所发现的常见共性之一就是那些期望总是比预计的更高。”

于奎尔，这种反身性在下面的引述中有极致的体现，即从下面的场景里，在说话人的自我消除中，完成了一连串的三个借口或否认：“大屠杀曾经是一个可憎的时期，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我是指在这个世纪的历史上。但我们现在都生活在这个世纪里。我之前没生活在这个世纪里。”这一连串递进中的逻辑不容置疑：首先，在他对自己国家的黑暗过往做出解释的渴望里，奎尔将这段历史归于这个世纪的罪行，而这点之前没被确认；然后，他又退回来，强调他的国家没有承认这种罪行；在无望转回到合理解释某人过往的逻辑后，他构建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不再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我们所有人生活过的上个世纪，而正是这个世纪应该为大屠杀负责；最后，在意识到他在发言里所制造的混乱后，他像之前一样自动选择了快速逃离，将他自己排除在他的国家之外。简言之，以一种塑造高德温式“包括我在

外”的完美反转姿态，奎尔“把自己排除在”他的世纪“之内”！这也就难怪，在这通纠缠之后，他做了个陈述，堪称是对布什的最简洁勾勒：“那些真正的怪人能身居要职并对历史造成巨大影响。”

在两个方面，布什比奎尔走得更远；第一个是后现代关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法。在布什的想法里，不确定性（关于敌人的经验特征），远非用于降低危险，而是辩证地将不确定性转换成更高级别的确定性，即一定有敌人，事实上最危险的是我们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因此，敌人的不确定性越多，我们就越能确定敌人就潜伏在那儿：“这是一个不确定性比以前多很多的世界。以前我们是确定的，我们确定当时是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对抗。因为确定，所以我们用很多核弹头彼此对准来保持和平……即使这是个不确定的世界，我们仍可以确定一些事情……我们确定这个世界上有疯子，有恐怖分子，还有导弹，我对此也很确定。”布什另一个超越奎尔的方面，是对基督的简短箴言“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的提炼反射性反转。布什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学到了识别欲望的辩证法：我们不是直接爱我们自己——我们实际上所爱的，是我们被他人所

爱的，也就是说，我们爱的是别人爱我们这件事：“我们都必须听从这个普遍的号召，爱你的邻居，爱如你自己所希望被爱的方式。”

那么不走运的布什该做什么来避免奎尔的悲惨下场呢？如何去驱散愚蠢自由民众的愚昧轻率？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欣赏隐含在他的陈述里的辩证技巧。众所周知，诚然从崇高到荒唐只要一步，但反之亦然。因此，或许布什该学学海德格尔从同义赘述的反转中生成深层次见解的艺术。也就是说，当我们复述海德格尔的著名反转“真相的本质是本质的真相”（*das Wesen der Wahrheit ist die Wahrheit des Wesens*）或他的修辞策略，即把某一领域的精华排除在这个领域自身之外（“技术的本质是没有技术”）时，其触动我们的只能是，这些如何轻易地就将布什主义的某些东西变成了一种有深意的想法。“这就是‘保存月’^①。我欣赏保存。这就是竞选总统时要做的，必须得保存。”可以被翻译成：“保存的本质并非保存我们物质资源的实体。保存的本质是保存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本质——这就是美国总统必须得做的，

① 布什曾口误将“苦撑苦度的一个月”（*a perseverance month*）说成“食物保存的一个月”（*a preservation month*）。

即使是在庸俗的实体层面，布什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比整个美国历史上破坏的都多。”

通过掌握这种艺术，布什再次证明他是比尔·克林顿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因为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倾向在克林顿时代已现端倪：当克林顿被检察官问到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时（“那是真的吗？”），他那无耻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你对‘是’的定义，”他在这么说的时侯，所指的难道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Seinsfrage）吗？^[50]

回想一下格劳乔·马克斯的经典台词：“这男的可能看起来像傻子，动起来像傻子，但别让这些给骗了——他真就是个傻子！”希区柯克《惊魂记》的结局不就是这个笑话的一个翻版吗？“这个女人（朱迪）可能看起来像玛德琳，动起来像玛德琳，但别让这些给骗了——她真就是玛德琳！”^[51]

变奏

◎回想一下经常被提起的，马克斯兄弟关于拉维利的笑话：斯波而丁：怎么说呢，我之前认识一个家伙和你看起来很像，名字叫……呃……伊曼纽尔·拉维利。你是他兄弟吗？拉维利：我是伊曼纽尔·拉维利。斯波而丁：你是伊曼纽尔·拉维利？拉维利：我是伊曼纽尔·拉维利。斯波拉丁：哇，难怪你看起来像他……但我还是要肯定地说，的确有像的地方。^[52]

富人告诉仆人：“把这个穷要饭的赶出去——我太脆弱了，看不得别人受苦！”现如今，这个笑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贴切。^[53]

一个老笑话，来自已消亡的东德，一个德国工人得到一份在西伯利亚的工作，他意识到所有的信件都要被审查，因此告诉他朋友：“我们设个暗号，如果你收到的信是用蓝墨水写的，就是真话；如果是红墨水写的，就是假话。”一个月后，朋友收到了第一封信，用蓝墨水写的：“这儿一切都很棒：商品丰富，食品充足，公寓很大，供热也好，电影院放的都是西方电影，可以搞艳遇的漂亮妞多的是——唯一搞不到的就是红墨水。”

这难道不是我们迄今为止的处境吗？我们有着想要的所有自由——唯一缺的就是“红墨水”：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我们缺乏恰当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不自由。这个缺失的红墨水，在现今意味着，那些我们用来指明现状冲突的主要术语——“反恐战争”“民主和自由”“人权”等。——都是错误的术语，迷乱我们对时局的感知来取代我们对时局的思考。现今任务就是给抗议者红墨水。^[54]

在一出好莱坞无厘头喜剧的经典台词里，女孩问她的男朋友：“你想娶我吗？”“不！”“别躲躲闪闪了！给我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这里面的潜在逻辑是对的：女孩能接受的直接答案只有“是”，所以所有其他答案，包括直截了当的“不”都算是借口。当然，这个潜在逻辑，也是个强制选择：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前提是你做了正确选择。一个牧师在和一個不信神的俗人争论时，不也遵循着同样的悖论吗？“你信神吗？”“不。”“别躲躲闪闪了！给我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在神父眼里，也是这样，唯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宣告一个人对上帝的信仰：其所持的远非不偏不倚的鲜明立场，无神论者对信仰的否定不过是一次躲闪与神邂逅的企图而已。今天所面对的“民主主义还是原教旨主义”的选择不也是一样吗？并非把这种选择包括在内，难道不是根本就没可能选择“原教旨主义”吗？主导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这个选择，在方式上的问题不是来自“原教旨主义”而更多来自“民主主义”自身：就好像“原教旨主义”的唯一选择是议会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55]

在以色列，有一个关于克林顿访问比比·内塔尼亚胡的笑话：克林顿发现比比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神秘的蓝色电话，他问比比是做什么用的，比比告诉他他是用来给上帝打电话的。回国后，嫉妒的克林顿要求他的情报机构给他也配个这样的电话——无论花多少钱。两周的时间，他们给他弄来了，能用，但电话费惊人地高——和上帝通一分钟话要两百万美金。所以克林顿狂躁地打给比比抱怨：“你怎么能负担起这样一部电话？即使对给你们金援的我们，也负担不起！难道你就是这样花我们的钱的？”比比淡定地回道：“不，不是那样——您看，对我们来说，犹太人，这算本地通话！”

有趣的是，笑话的苏联版本，上帝被换成了地狱：当尼克松访问勃烈日涅夫时，发现一个特别电话，勃烈日涅夫解释说，这是和地狱的连线；笑话的结尾，当尼克松抱怨话费时，勃烈日涅夫淡定回应：“对我们苏联人来说，打到地狱算本地通话。”^[56]

我们应该由此假定，集中营和用于人道援助的难民营，是同一社会逻辑正式母体的两张脸：“人道的”和“非人道的”。两种情形下，刘别谦在电影《你逃我也逃》^①中的残酷笑话都适用：当被问到在被占领的波兰，德国集中营的情况，名为“集中营的艾哈特”的角色反击道，“我们负责集中，波兰人负责扎营”。（2002年1月安然公司破产，不也适用同样的逻辑吗？可以被诠释成某种针对风险社会概念的讽刺性注脚。数以千计的职员丢掉了工作和存款，确定无疑地承受了风险，但无法做任何正确的选择——这风险于这些人是无可避免的命运。相反，那些实际上可以看到风险并可能对局势进行干预的人〔高管们〕，通过在公司破产前变现他们的股票和期权最小化了他们的风险——实际的风险和选择因而被巧妙地分置了。所以，在流行概念的恰当诠释里，现今社会就是这样一些风险性的选择，我们可以说，一些人〔安然的经理们〕负责选，另一些人〔那些普通职员〕负责承担风险。）^[57]

① *To Be or Not to Be*，公映于1942年。

《你逃我也逃》中最滑稽的一幕是，自命不凡的波兰演员约瑟夫·图拉，其秘密任务的一部分，是得假装残酷的盖世太保高级长官艾哈特，他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假扮，在交谈者提到那些艾哈特对波兰人残酷虐待的流言时，他报以恶俗的大笑并做满意状：“所以他们叫我集中营的艾哈特！哈哈哈哈哈！”我们，作为旁观者，将这看成是一幅荒唐的讽刺画——然而，过了一会，图拉逃了而真正的艾哈特来了；当谈话中再次谈到那些关于他的流言时，他面对交谈者的反应，竟然和他的模仿者是一模一样的荒唐和夸张。这里的信息很明确：即使艾哈特自己，也不是当下的他，他也需要模仿自己的副本，或者，更准确点说，他自己的荒唐念头。图拉演的是他，他演的是他自己。

在希区柯克的《惊魂记》里，我们发现一个更悲剧的版本，也是一样的离奇巧合：出身贫苦的朱迪，迫于斯科蒂的压力和对他的爱，努力让自己的样子和举止都像出身上流社会的优雅玛德琳，最后变成玛德琳；她们变成了同一个人，之前斯科蒂遇到的“真正的”玛德琳则成了冒牌货。

然而，这种朱迪和朱迪版玛德琳的身份同一性再次诠释了玛德琳相对于朱迪异常明显的绝对差异性——玛德琳身处无地，她只是作为缥缈的“灵晕”外衣，包裹了朱迪版玛德琳而已。^[58]

边沁^①开发了“自体圣像”这个独特概念，其含义是，一件东西的最好标签是它自己（如在刘易斯·卡罗尔^②的笑话里，英国人以前用更大的地图，直到他们最终确定用英国本身作为它自己的地图）。^[59]

① 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人，哲学家、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无神论者，功利主义者。

② 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1832—1898)，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小说家。《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作者。

抑郁者所哀悼的，是他还没有真正失去的，关于哀悼的悲催过程，有个滑稽的内在颠覆，在哀思中起作用，就像那个老旧的关于吉普赛人的种族主义笑话：下雨时，吉普赛人很开心，因为他们知道，雨后总会有阳光；出太阳时，他们很难过，因为他们知道，晴天之后，在某个时间，总会下雨。^[60]

在一个苏联的老笑话里，有听众问电台的埃里温：“拉宾诺维奇买全国彩票中了辆轿车吗？”埃里温回答：“原则上，是——他中了。但奖项不是一辆轿车，而是一辆自行车，不是新的而是旧的，而且不是中奖，是从他那儿偷来的！”^[61]

有个在前南斯拉夫很流行的种族主义老笑话，讲一个精神科医师为一个吉普赛人做检查。精神科医师先和吉普赛人解释了什么是自由联想：根据医生的提示，马上说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然后，测试开始：医生说“桌子”，吉普赛人回答：“和法蒂玛做爱”；医生说“天空”，吉普赛人回答：“和法蒂玛做爱”；如是反复，回答总是一样，后来医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你根本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当我说词的时候，你必须告诉我你脑子里出现的想法，你正在想的东西！”吉普赛人淡定地答道：“对，我理解你说的了。我又不傻，不过我满脑子想的一直都是和法蒂玛做爱！”^[62]

这个笑话，清晰展示了黑格尔“抽象普遍性”的结构，但仍需要在另外一个笑话里起作用的关键的最后转折来补充。生物老师对一个小学生进行测试，考他各种动物，小学生每次回答时，总能把答案转到对马的定义上：“什么是大象？”“生活在丛林里的一种动物，那儿没有马。马是一种驯化的哺乳动物，有四条腿，被用来骑，在地里干活或者拉车。”“什么是鱼？”“一种没有腿的动物，不像马。马是一种驯化的哺乳……”“什么是狗？”“一种不像马的动物，会叫。马是一种驯化的哺乳……”如是反复，直到最后，绝望的老师问小学生：“好吧，那什么是马？”小学生傻了，完全找不着北了，开始一边嘟囔一边哭，什么答案也说不出来了。^[63]

那些关于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的笑话，通常展现出对拉康理论颇感兴趣的结构——举个例子：为什么没法和图季曼玩“捉迷藏”？因为一旦他藏起来，没人乐意去找他……欲望角度的合理诠释是，只有人们真正乐意找你，躲起来才有用。但最棒的例子是关于图季曼和他的一大家子在克罗地亚坐飞机的笑话。意识到有传言在说很多克罗地亚人过着悲惨、不幸的生活，而他和他的党羽却积累了大量财富，图季曼说：“我把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扔出窗外怎么样？至少可以让那个捡到的克罗地亚人开心。”他阿谀的老婆说：“可是图季曼，我亲爱的，你为啥不扔两张五十万的支票下去呢？这样就可以让两个克罗地亚人开心了。”他女儿接着说：“为什么不是扔四张二十五万的呢？这样就可以让四个克罗地亚人开心了。”然后如是反复，直到最后，他孙子——公认的无知青年，下意识地道出了真相——“可是爷爷，为啥你不简单点，直接把自己从窗户扔出去，让全国人都乐乐呢？”^[64]

两个源自东欧的，关于睾丸的粗俗笑话完美例证了反对派的愚蠢和无耻。第一个笑话，一个客人坐在酒吧里喝威士忌，一只猴子顺着吧台晃悠过来，停在他杯子前，把它的蛋放进去洗了洗，然后又晃悠走了。客人很震惊，只好又点了一杯威士忌；可那只猴子又逛回来了，又把蛋放进去洗了洗。客人发狂了，问酒保：“你知道那猴子为什么要在我的威士忌里洗它的蛋吗？”酒保回答：“我啥也不知道——去问那个吉普赛人，他什么都知道！”那个吉普赛人在酒吧里到处转，拉小提琴、唱歌，给客人们提供消遣。客人转而找到吉普赛人，问他：“你知道那猴子为什么要在我的威士忌里洗它的蛋吗？”吉普赛人淡定地回答：“是，当然！”然后开始唱，曲调悲伤忧郁：“那猴子为什么要在我的威士忌里洗它的蛋，噢，为什么……”笑点当然是在于，吉普赛音乐家会上百首歌，会按客人的要求来表演，所以他把那个客人的问题当成了一个要求，唱一首关于猴子在威士忌里洗它的蛋的歌。这是对意识形态最纯粹的诗意表达。

第二个笑话发生在14世纪，俄国被蒙古占领

时期。一个农民和他的妻子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路上，一个蒙古兵骑着马路过，告诉农民现在要强奸他妻子，蒙古兵还强调：“但因为这条路上尘土太多，我搞你老婆的时候你必须拿着我的蛋，这样它们就不会沾上灰了！”蒙古兵完事后刚骑走，农民就开始跳着脚乐。他惊诧的妻子问：“我刚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残忍地强奸了，你怎么还能跳着脚乐呢？”农夫答：“但我要到他了！他蛋上沾上土了！”这个悲伤的笑话讲出了反对派们的窘境：他们自以为对执政党的代表们（代表老百姓）进行了严重的打击，可实际上只是在代表们强奸民意时，给代表们的睾丸上沾了点土。现今的极左不也是类似处境吗？（现今那些说辞里，给权贵蛋上温柔抹灰的是“解构”和“保护个人自由”。）1936年，一次发生在萨拉曼卡大学^①的著名冲突里，乌纳穆诺^②和弗兰魁斯打趣道：“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你会赢，但你没法让人信。”）这不就是今天的左翼面对资本主义全球性胜利时所唯一能说的吗？难道左翼是宿命前定地要继续去扮演反对派角色，让

① 地处西班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② 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和作家。1901—1914年和1931—1936年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

人信但成不了（而且在追溯解释他们失败的原因时特别有说服力）？我们的任务是发现更进一步的方式——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题应该是：极左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做到的，只是给当权者的蛋上沾了点灰；而核心应是把它们割下来。^[67]

一个老笑话，苏联官僚式社会主义和南斯拉夫自我管理式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俄国，党代表们自己开豪车，而在南斯拉夫，老百姓自己坐豪车，通过他们的代表。^[68]

无疑，剧院里最厉害的笑话大王（和马克斯兄弟剧团的笑话相比）就是巨蟒剧团。他们的《人生的意义》剧中一幕发生在—对夫妇的公寓里。来自“活器官移植”商业组织的两个人，敲开这对夫妇家的门，要这个丈夫的肝。可怜的丈夫拒绝：只有他死了，他们才有权利取他的肝；但这两个家伙向他保证，把肝取走，他就无论如何也活不了了。

然后这两人就开始干，冷酷麻木地把血淋淋的器官从受害人的内脏里拉了出来。妻子看不下去，就往厨房跑，其中一个家伙就跟着她，也要取她的肝。妻子不干；然而，一个绅士从冰箱里走了出来，歌颂着宇宙中的亿万星辰和他们的智慧、品格。妻子意识到，她的问题与宇宙相比是如此渺小，就愉快地同意捐肝了。^[69]

对他者的固有参照可以用《没有莱波雷洛就没有唐璜》^①来解释（与征服本身带来的欢愉相比，唐璜显然更看重莱波雷洛对他征服事迹的记录）。一个关于社会底层人士的笑话，一个贫农从一次海难中幸存下来，发现自己和辛迪·克劳馥^②在同一个荒岛上。两人搞过之后，辛迪问农民是不是很满意；农民说是，但仍有一个小要求，能实现才算是百分百满足——她能穿上裤子，在脸上画上胡子，装扮成他最好朋友的样子吗？辛迪很吃惊，怀疑农民实际是个变态，农民安抚她，说根本不是她想的那回事，她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后来，她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时，农民凑过来，一把搂住她，脸上带着男人那种特有的猥琐笑容：“你知道我刚干了什么？我刚睡了辛迪·克劳馥！”^[70]

① 莫扎特的歌剧，讲述的是一位西班牙的贵族唐璜的故事。他要求仆人莱波雷洛帮助他，把每位与他交往的女子的芳名都记在小册子上，作为其“丰功伟业”的证明。

② 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1966—），美国著名超模。

受虐狂求虐待狂狠狠打他，而虐待狂回以一个恶意微笑：“不，绝不……”这个蠢笑话，如德勒兹^①所强调的，完全没在点子上：受虐狂和虐待狂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互补的；也就是说，受虐狂和虐待狂明显没法成为理想中的一对；他们的关系也显然不可能是各取所需的伴侣关系（就是说，受虐狂的痛恰是虐待狂的乐，或者反过来）。^[71]

① 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1925—1995），法国当代哲学家。

在他的一封信里，弗洛伊德提到个笑话，一个新婚丈夫被朋友问到，他老婆长啥样，有多漂亮？他的回答是：“我个人不喜欢她，但这是个品位问题。”^[72]

希区柯克讲过一个笑话，实际上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在火车上”的笑话，笑话里将一件东西称为一个“麦菇芬”^①。这个笑话还有个结局迥异的南斯拉夫版本：

“行李架上的包裹是什么？”

“是麦菇芬。”

“那是干什么用的？”

“杀死高原上的狮子。”

“可高原上没有狮子。”

结尾警句 A：“好吧，那就没有麦菇芬。”

结尾警句 B：“你看，麦菇芬起作用了。”^[73]

① McGuffin，意为“驱动细节”。

黑格尔式的主题通过反思、自相关和重新运用逻辑运算符的方式精确浮现，像在那个老掉牙的笑话里，食人者吃了部落里最后一个食人者。^[74]

从这里面能够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在努力回答“反犹太思潮里，为什么犹太人特别选中来当替罪羊”这个问题时，我们可能会轻易屈从于反犹太主义的特别陷阱，去找一些似乎会前定犹太人充当替罪羊角色的神秘特征：事实上，那些被选中的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角色归根到底是偶然性的——如在一个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笑话里所指出的：“犹太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要对我们所有的麻烦负责——为什么是骑自行车的人？——为什么是犹太人？”^[75]

其潜在机制由米歇尔·佩奇尤科斯^①藉有关类型的笑话做了精当阐述：“爸爸出生在曼彻斯特，妈妈出生在布里斯托尔，而我生在伦敦；真奇怪我们仨竟会认识！”^[76]

① 米歇尔·佩奇尤科斯 (Michel Pécheux, 1938—1983)，法国哲学家。

这样一种对黑格尔的理解难免和“绝对知识”这个公认的概念背道而驰，“绝对知识”作为一种概念性整体怪物，吞噬了所有的偶然性；这种黑格尔式的老生常谈就像下面笑话里的巡逻士兵，只不过是射得太快。故事是讲雅鲁泽尔斯基^①时期的波兰，当时军事政变刚结束。那个时期，军队的巡逻兵在宵禁（十点）以后，有权不加警告地射击路上行人。两个士兵在巡逻，其中一个看到有人在差十分十点的时候急匆匆地走在路上，马上开枪打了他。他的同伴问他为什么开枪，毕竟还差十分十点，他答道：“我知道那个家伙——他住得离这儿很远，无论如何十分钟内也到不了家，所以为了省事，我就现在射了他。”^[77]

① 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2014），波兰陆军将领、政府首脑（1981—1989）和总统（1989—1990）。

要点在于，如拉康所说，皇帝只是在他衣服下面一丝不挂，所以，如果有一种不加掩饰的精神分析姿态，会接近于阿方斯·阿莱士^①的笑话：有人指着一个女人，惊恐地喊：“看她——太丢人了，她衣服底下是完全光着的！”^[78]

① 阿方斯·阿莱士 (Alphonse Allais, 1854—1905)，法国作家、编剧。

有个黑格尔式的笑话，完美例证了真理自误认而生的过程——在我们寻找真理的路上，碰巧遇到了真理本尊。世纪之初，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同坐一辆火车，脸对脸。波兰人变得很焦躁，一刻不停地盯着犹太人看；如鲠在喉，终于他忍不住了，冲着犹太人喊：“告诉我，你们犹太人是怎么做到的，榨空别人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还能靠这种方式赚到你们所有的钱？”犹太人回道：“行，可以告诉你，但不能白告诉；你得先给我五个兹拉第（波兰钱）。”收了钱之后，犹太人开始说：“首先，你拿一条死鱼；把头切下来，把内脏放在一杯水里，然后，半夜十二点左右，月圆之时，你必须把这个杯子埋进墓地里……”“然后呢？”波兰人猴急地打断他，“我要是把这些都做了，是不是也就变有钱了？”“没那么快，”犹太人答道，“你必须要做的，这还不是全部；但如果你想听剩下的部分，你还得再给我五兹拉第！”又收了钱以后，犹太人开始接着讲他的故事；没过一会儿，他又耍钱，如是反复，直到最后，波兰人愤怒地爆发了：“你个臭流氓，你真以为我没闹明白你究竟想干什么？根本就没有秘诀，你就

是想从我这儿榨空最后一分钱！”犹太人淡定而又无奈地答道：“好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犹太人，是怎么……”^[79]

变奏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笑话，以传授犹太人如何从别人那儿榨走最后一分钱的秘诀为借口，火车上的犹太人从波兰人那儿把钱榨走了。魏宁格反女权主义立场的疯狂吐槽——“根本就没有女性的秘密；在谜样面具的背后，什么也没有！”——跟波兰人的愤怒是一个水平，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只是在不断地榨走他更多的钱，不断推脱揭开最后的谜底，而波兰人直到最后发觉这一切，才喷涌出怒火。魏宁格没能做到的，是做出一种姿态，用来回应犹太人面对波兰人怒火时的反应：“好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犹太人，究竟是怎么从别人那儿榨钱的……”——也就是说，一种可以将失败再诠释，再定义为成功的姿态——诸如“看，因为女人是最卓越的主体，而非反对主体力量的有限客体，所以，这种面具下的空无一物，是对此非常绝对的否定。”^[80]

另外一个笑话也具有完全一样的结构，但通常这一点被忽视了——我们指的是卡夫卡《审判》的第九章里，关于法律之门的笑话，结尾转折处，从乡下来的濒死男人问门卫：“人人致力于求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只有我想进到门里去？”门卫估计他快不行了，也快听不见了，就冲着他耳朵喊：“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因为这扇门就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就去关上它。”^[81]

我们甚至可以为卡夫卡的故事发明另一个结尾，让这个故事更接近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笑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乡下来的男人在愤怒中爆发了，开始向门卫哭诉：“你个臭流氓，为什么你假装你把守的地方藏着惊天的秘密，实际上你很清楚，门后面根本就没有秘密，这个门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来俘获我的欲望！”门卫（如果是个分析家）会淡定地回答：“你看，现在你发现真正的秘密了：那道门后面，只有把你带到这里来的你的欲望。”^[82]

拉康研究者的《信的标题》^①更接近于画的标题；如笑话“某人在华沙”里的描述。在华沙的一个艺术展览上，有一幅图画是展示一位女士，某人的老婆，和一个年轻的共青团员在床上，画的标题就是“某人在华沙”。一个困惑的游客问向导：“可某人在哪？”向导平静而又郑重地答道：“某人在华沙。”^[83]

①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Lacoue-Labarthe 著，纽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某人在华沙”的笑话例示了主人能指^①的逻辑，还有另一个笑话——以其对称反转的方式——例示了客体的逻辑：一个人想逃兵役，因而装疯。他的症状是强迫性地检查所有能拿到手的纸，然后不停地絮叨：“不是这个！”他被送去看军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他还是到处翻纸看，连垃圾桶里的都不放过，嘴里不停地重复：“不是这个！”医生最终确信他的确是疯了，给他写了免于参军的书面证明。这个被征召的家伙拿起来看了看，高兴地说：“就是这个！”拉康式的客体，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实体，作为主体找寻的结果而浮现。^[84]

① *master-signifier*，符号性权威的空洞能指。拉康称之为“没有所指的能指”，即同义反复、空空如也的能指。齐泽克有时称之为“符号性虚构”。

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多个同源的笑话来阐述：“这是威灵顿公爵^①发表他著名讲话的地方吗？”“是的，就是这个地方，但他从来就没说过那些话。”这些从没说过的话是一种拉康式的真实。我们可以无限引证下面的例子：“史密斯不仅不相信有鬼；甚至也不怕鬼！”……直到说到上帝本尊，属于拉康式的真实：“上帝非常完美，除了一点——他根本就不存在！”^[85]

① 威灵顿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 英国将领、首相。

如同一个苏联笑话，拉宾诺维奇，一个想要移民的犹太人。移民处的官僚问他原因；拉宾诺维奇回答：“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担心共产党在苏联会倒台，那就会有反革命，然后新政权会把共产党的错都算给我们，犹太人——反犹太屠杀就会再次发生……”“但是，”官僚打断他，“这完全不靠谱，在苏联一切都不会改变，共产党的政权万古长青！”“好吧，”拉宾诺维奇淡定应道，“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原因。”^[86]

变奏

◎这种调和结构在成熟期的黑格尔思想里，仍可以用这个拉宾诺维奇的笑话来表示：“有两个原因现代社会是可以和其自身相调和的。第一个原因是公民社会的互动……”“但公民社会互动是种经常性冲突，分崩离析的机制和残酷无情的竞争！”“好吧，这就是第二个原因，由于这种冲突和竞争使个体彻底独立，并因而产生最终的社会联系。”^[87]

◎我们在这儿回到了拉宾诺维奇笑话的结构，“你为什么认为你被剥削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工作的时候，资本家占有了我的剩余价值。”“但你现在没工作呀；没人占有你的剩余价值，因为你根本就不创造价值。”“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所有纠结于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的全部生产不仅创造劳动力需求，也产生了没法找到工作的“后备队”：后者并非简单地置于资本的流通之外，而是在这个流通中，积极地以不工作为生产。或者，仍旧以妮诺契卡的笑话为参照，他们的不工作是他们的积极特征，和“不加奶的咖啡”是其积极特征如出一辙。^[88]

◎因此，再来重述一下拉宾诺维奇笑话里的经验：“因为两个原因，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第一，我们想找到耶稣的墓，和神迹同在。”“但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墓是空的，什么也找不到，你们能发现的只有你们自己，一群基督徒。”“对啊，这个社会的精神就是活着的耶稣，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真正要找的！”对耶稣复活这件事也是一样：“耶稣会复活的！”“但我们，他的信徒，一直在等着他，我们啥也没看到。”“对，你没看到——你没看到这个社会的精

神，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爱，这就是复活的耶稣！”同样的东西甚至可以适用基督再临的整个主题：没有什么会“真的发生”，没有神示现的奇迹，人们会意识到神已经在这儿，在他们的集体精神里。^[89]

◎关于拉宾诺维奇的笑话，有个出人意料版本在前南斯拉夫流传：一位士官想教导一位吉普赛士兵，决定采用教他诗歌的方式；为了跟士兵解释什么是押韵，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弹巴拉莱卡^①，我睡你妈。”（在塞尔维亚语里，此句话押韵：Igram balalaiku, yebem tvoiu maiku.）吉普赛人回答：“哦，我会了！这有一句：我弹巴拉莱卡，我睡你老婆。”士官评价道：“但这句不押韵！”吉普赛人回嘴：“是不押韵，但是真事。”

要点在于，在塞语里，最后这句是松散押韵的（Nije rima, ali je istina），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韵，但吉普赛人的第二个回答，针对士官对他第一个回答的反应，就是错的了（没有押韵）。^[90]

① balalaika，俄式三弦琴。

◎这就是黑格尔所设计的辩证性转换，即论断本身变成了主题——这种转换，仍旧可以重述成另一个版本的拉宾诺维奇笑话：“我发现女性气质的本质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女性气质是分散的，无处可寻的。”“对，这种分散性就是女性气质的本质。”^[91]

◎然而，现如今，犹太人实际上怕的，是随着苏联斯大林主义瓦解和冒出来公然反犹的民族主义势力，对他们的指责会再次加诸于身，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轻松设想一个逆转版本，当拉宾诺维奇回答官僚的问题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知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会万古长青，任何东西都不会有实质的改变，这种前景是我无法忍受的。”“但是，”官僚打断他，“这完全没道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会受到严厉惩罚的！”“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原因！”拉宾诺维奇答道。^[92]

通过将真相表述成谎言，一种现象因而可以准确地讲述这真相。如经常被拉康引用的那个弗洛伊德的笑话，犹太人责备他的朋友：“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而不是伦贝格，你就真去了克拉科夫？”（讲真话意味着对主导他们关系的隐含欺骗代码的破坏：当其中一个人之前说去克拉科夫时，另一个人认为他在说谎，他的实际目的地是伦贝格，反之亦然）。^[93]

变奏

◎合法化政党统治的基本语义轴是介于自治社会主义和“官僚政治”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换句话说，党和国家的官僚制把它的统治合法化，是通过一种将其自身指定为主要敌人的意识形态。因此，一个南斯拉夫平民可以向掌权的官僚提问，和之前笑话里犹太人所提的同样逻辑的问题。“当党和国家官僚制就是最大的敌人时，为什么你还要告诉我工人自治的最大敌人是党和国家的官僚制？”^[94]

◎如这个犹太老笑话的一个新版本：“你是有礼貌的，可为什么要表现得像你之前是有礼貌的？”^[95]

◎这种象征秩序的神秘性，可以由一种高深莫测的状况，我们称之为“礼貌行为”的，来例示：当碰到熟人的时候，我会说“很高兴见到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们俩都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我“所说的不是认真的”（如果我的朋友怀疑我真的对我的问题感兴趣，他可能会更不高兴，因为就好像我要刺探些太私密但又和我没啥关系的事——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老笑话来演绎：“当你真的见到我很高兴时，为什么还要说见到我很高兴？”）^[96]

◎两种表现（事物对我们所呈现出的样子和事物真正的样子）间的差异和弗洛伊德的那个笑话的结构是相通的，即一个犹太人跟他朋友抱怨，“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而不是伦贝格，你就真去了克拉科夫？”也就是说，在商品拜物教的情形下，当我迅速意识到金钱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纽带，而非什么有魔力的东西时，我把钱只当作我个人生活实践里的一个神物，因此，对

拜物教进行定位就是我真正的社会生活实践，我可能实际上被指责为：“当金钱真的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纽带时，为什么你还说金钱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纽带？”^[97]

◎犹太人对他旅行的真实目的地跟他的朋友撒谎，用真相本身来做掩饰，接下来，我们只能再重述这个弗洛伊德的老笑话：“当他们应该认真听取抗议者的意见时，为什么克林顿要说他们应该听取抗议者的意见？”^[98]

◎所以，“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而不是伦贝格，你就真去了克拉科夫？”顺着这个有着弗洛伊德气质的广为人知的犹太笑话的脉络，容易受骗的男伴对美女荡妇的潜在指责可以被表达为：“当你真的就是个爱摆布人的冷血婊子时，为什么你还要表现得像你就是个爱摆布人的婊子？”^[99]

真相所带来的后果见下面的笑话，一个病人向他的分析师抱怨，他床底下有条大鳄鱼。分析师跟他解释，这是他虚妄的幻觉，然后开始逐步治疗，之后病人就不来了。两三个月之后，分析师在街上碰到有着鳄鱼想法的前病人的一个朋友，就问朋友病人现在怎么样了；朋友回答：“你说哪一个？那个被藏在他床下的鳄鱼给吃了的那个？”^[100]

然而，这只是阳具悖论的一面；其另一面借由一个字谜笑话彰显：“究竟什么东西最轻？——阳具，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只靠意念就能举起来的東西。”^[101]

变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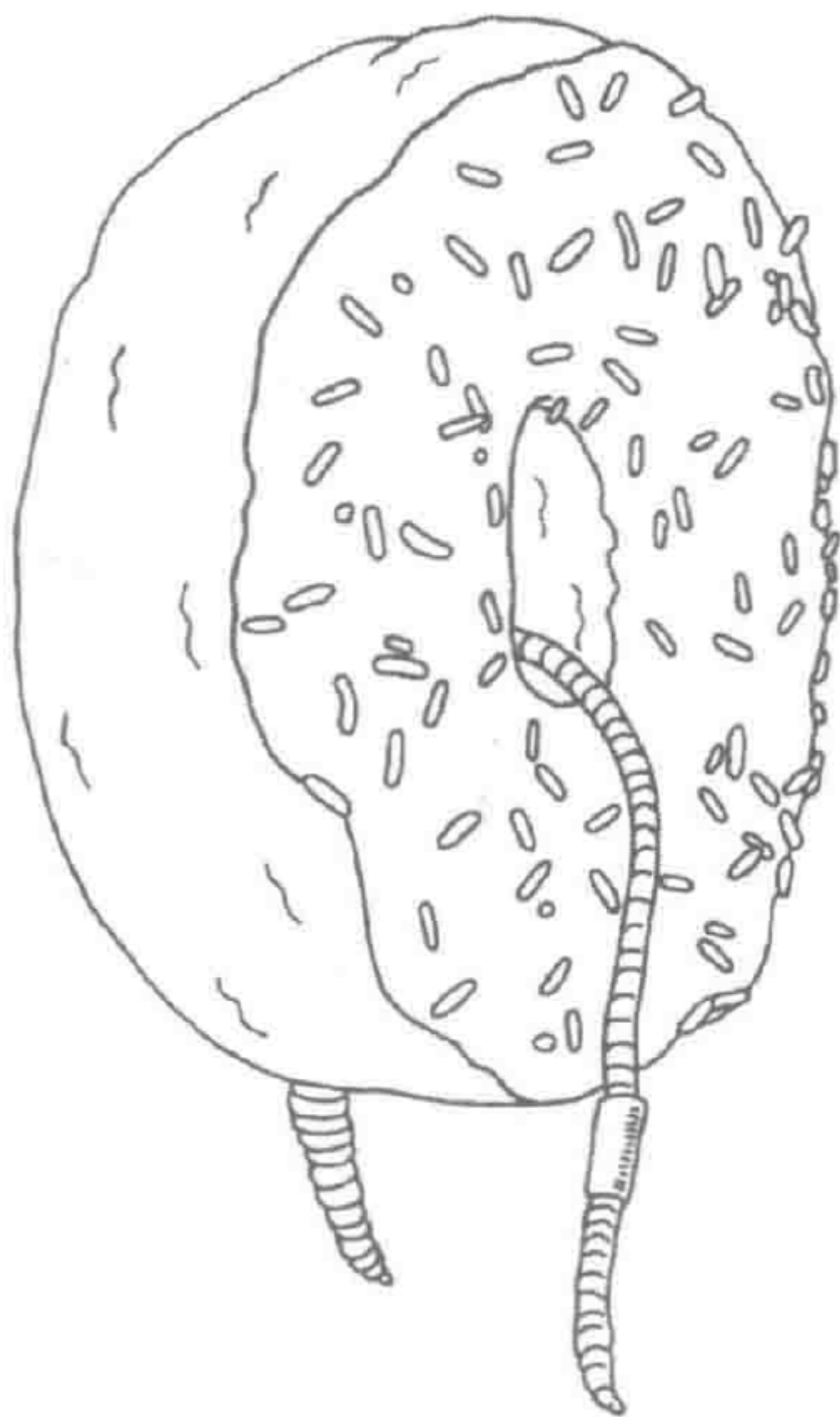
◎勃起完全靠我自己，靠我的意念（像这个笑话里讲的：“世界上最轻的东西是什么？阴茎，因为这是唯一仅靠意念就能举起来的東西！”），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最终我什么也控制不了。（如果我情绪不对，意志力再强也没用——这就是为什么，对圣奥古斯丁^①而言，勃起不受意念控制的事实，是神对一个男人的惩戒，因为他的傲慢和自大，妄想成为宇宙之主。）^[102]

①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宿命论影响了后来的神学家，尤其是J.加尔文。中世纪早期被尊为教会权威神学家。

“你听过那个笑话吗？一只傻蠕虫想要日一只肥面包圈？”

“没有。”

“我也没有。”



喜剧是一场合法化危机
以突如其来的丰饶结束

编后记

莫墨斯

有一个笑话在我的《笑话书》（一部完全以讲笑话方式呈现的家庭故事小说）里出现过两次。我从齐泽克那儿学来的，他则归为弗洛伊德的东西。一篇写于2004年的文章，题为“伊拉克人借来的水壶”。一开头，齐泽克就说，“我们都记得，那个关于借水壶的老笑话，弗洛伊德用来诠释梦境的奇怪逻辑，这个笑话就是列举各种应对指责（我还给朋友一个破水壶）的相互矛盾的说法：（1）我从来没跟你借过水壶；（2）我还你的时候壶没破；（3）我从你那儿拿走的时候，壶已经破了。”这是个笑话还是谜语，抑或两者都是？这是一种情境的模型，齐泽克说。是一种结构。

齐泽克看来有个非常适合识别特别情境模型的脑子。在思考现实世界的某些事情时，齐泽克会立马发现，其中有跟某个他听过的笑话里的荒谬情境一样的结构，笑话往往来源高大上：德里达，拉康，或弗洛伊德。

这种技巧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或可称之为

“深刻之轻”。目睹了哲学大师们引人入胜的玩笑嬉闹，我们或许开始意识到，哲学，在其最高级、最明智的层面上，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玩笑或戏弄；“诸神的微笑”。真实世界中的特定场景可以如笑话一样荒谬，不证自明地充满笑料，不管实际上有多悲催。

历史，齐泽克喜欢提醒我们——去援引马克思，他自己则援引拉康，首先是作为悲剧上演，然后是闹剧。而闹剧里的笑声有着崇高的一面；笑声让我们想象，那些成套想法里的冗余和那些令人目眩的过剩选择的诞生。喜剧是一场合法化危机，以突如其来的丰饶结束。

通过夸张的手法，在我讲述的水壶故事里，其情境变成了闹剧。我父亲受一盆植物的主人们之托，来照看这盆植物。植物的主人们去度假了，为首的是一个小小个子半吊子律师，谨小慎微。我父亲完全忘了给植物浇水，植物枯死了。他为了保护自已，做了如下自我辩护：

1. 这盆植物从来没交给我照管。
2. 实际上，这盆植物以前是他的。
3. 这盆植物是托付给他了，但他没承诺会完好无损地归还。
4. 他跟诸神发过誓要毁掉这盆植物，他只是

履行了他的誓言。

5. 这植物之前任何问题都没出过。

6. 他真希望他从来没借过这盆植物，从他看到它的那一刻起，它就枯萎了。

7. 这种类型的植物天生就是枯萎的，甚至，就是个枯萎标本。

8. 尽管他尽了力，植物还是枯萎了，归罪于一场苍蝇瘟疫。

9. 枯萎是坏的只是因为我们的习惯于把枯萎想成是坏的。

10. 事实上，健康绿色的萌芽生长是一棵植物最难以忍受的痛苦。

11. 健康绿色的萌芽生长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

12. 枯萎——是很受敏感植物欢迎的——是“新的”健康绿色的萌芽生长。

13. 因为健康绿色的萌芽生长是好的，所以枯萎也是好的。

14. 反之，因为健康绿色的萌芽生长是令人憎恶的，所以枯萎也是令人憎恶的。

15. 在我的看护下，不可能会有像植物枯萎这样糟糕的事情发生，所以，它没枯。

16. 在你不在的时候，健康植物已经不流

行了。

17. 这不是你留给我的那盆植物。

18. 尽管样子不好看，但无论怎样，这是一棵健康的植物。

19. 看，那儿，你后面！一只小猫！

20. 这盆植物已经自杀了。

我的父亲在书中是个怪物式的角色，我们也无法喜欢他。这个诸多借口的“水壶清单”是动机不纯的——为了掩饰一种疏忽的行径——但其稀释性、创造性、精巧性和不符合逻辑已经开始让我们觉得有趣和新鲜，就像一幅立体主义绘画的情境，可能没有加入任何像是“真实的东西”，但却开始用一种纯粹的可能性让我们目眩，又或者像一个聪明的孩子面对心理学家测试时，所给出的答案。我们开始看到，在仅有的正当性或仅有的正确性之外，是一种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大多喜欢压制创造力的社会，过分强调讲真话。“每个谎言在自己创造的平行世界里为真。”这是指导我创作《苏格拉底之书》的警句，书里对我英国北部故乡的别样未来，有一系列兴奋狂热的情节想象。谎言是可以衍生的，可以帮助我们头脑风暴，免于陈腐，僵死的思维方式。笑话也有同样的能力；那些陈词的逻

辑，是基于对这个世界毋庸置疑的真实和正确理解，笑话，通过颠覆这种逻辑，给了让我们兴奋和目眩的多种可能性选择。政治评论家有个术语，叫“奥弗顿入口”。它是指一个政客可能秉持的中间派立场，不用担心被称为怪胎或疯子，而且用这种方式，他可能会根据入口的可接受性，在一定程度上偏左或偏右。准确地说，缺乏任何新鲜或原创的思考，锲而不舍地追求以此为出发点的民意调查和妥协，对一个职业政客而言，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任何精神独立者而言，这都是死亡魔咒。这种“精神独立”——可以发现好作者的范畴——必然会钟爱笑话的逻辑，因为这些笑话的核心本质游离于“奥弗顿入口”之外，违背一般常识和公认道德，还打破了诸多禁忌。

让我们这样说，这个世界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想正确的，一种是想有趣的。想正确的通常善于识别凌驾于人和自然之上的工具性能力。他们的正确性就是获取这种能力的方式。想有趣的希望去吸引，去诱惑，去教授，去惊扰，去影响，去羞辱，去迷惑。他们所拥有的能力被断定与现实的工具性能力无缘。

我不会让我的机长成为有趣的那个；我更希望他是正确的那个。但我会希望飞行中的电影

尽可能地有趣。相对于驾驶舱里的事，不管电影里发生了什么，飞机都不会掉下来。在我自己（真实的）家庭里，我的哥哥，一位学者，就是正确的那个，而我则是有趣的那个。我第一次听到齐泽克是通过我哥哥，他被我哥哥描述成“狂人，愣头青”。有趣，但可能靠不住。不是个实成家伙，但是个有趣的、不靠谱的历史讲述者，一个装扮整齐的小丑，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傻瓜。我哥哥一定知道，凭借这样一幅素描，我可能成为齐泽克的粉丝。

齐泽克的不靠谱，凸显在他用多种不同的形式重述同样的笑话。就好像在他文本里上演的，是某种民间口头文化的合成版本，正是这种文化创造了那些笑话，他用一系列的变化把同一个笑话圈起来，每次讲述不同的开头、结尾和道德应用。

齐泽克冒了一个险，看起来就像婚礼上有轻微智障的大叔，记不住他之前在另一个家庭聚会上刚刚给我们讲过的笑话，又或者记住了，但仍然觉得笑话太好笑，因此忍不住又讲一遍，但笑话的特点、缘起、措辞、长度和恰到好处的猥亵程度（我们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都是在新的语境里了。

因而那个未婚妻的笑话（我未婚妻约会从不迟到，因为如果她迟到了，她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在他的好几本书里都出现过，归因于拉康的多个观点和一个“古谚语”，并像破水壶那个笑话那样，被诠释成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不同应用。根据齐泽克，也根据具体的情境，未婚妻的笑话暗示着：

1. “人民永远支持着政党，因为人民中任何反对政党领导的，都自动将自己排除在人民之外了。”

2. “如果你爱上帝，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当你做了邪恶的事，这事本身就证明你对上帝不是真爱。”

3. “真相永远不能被强调，当真相的真实程度被过分强调时，我们所涉及的就不再是真相，不再是真相的真实性。”

4. “在应用一项规则时我从不犯错，因为我所做的就定义了准确的规则。”

5. 最具格言色彩的是，“与此同时，未婚妻被简化成未婚妻的符号功能。”依据另外一个齐泽克钟爱的笑话，当你真就是个未婚妻的时候，为什么还称自己为未婚妻？

让齐泽克把各种复杂情境进行浓缩，直到它

们可以被当成笑话来取悦读者。笑话之于齐泽克就像代数之于他的老搭档和老对手巴迪欧：是齐泽克所知的，概括一个日常情境模型的最精确方式。然而，和代数不同的是，笑话所带来的情境，只是借此成为一个笑话，情境所描述的随性暗示不再是必然合理的或不可避免的。将情境看成某种可笑的东西，让我们感觉到这些也是可以被抛之脑后的东西。笑声，在这种意义上，就是革命性的。

不满足于齐泽克的弗洛伊德水壶笑话在我的《笑话书》里只用一次，我又用这个笑话的形式设计了一个关于洋娃娃的笑话。路易莎在抱怨她爹，借走一个叫汉娜的洋娃娃后，还回来个破的。

“这是最糟糕的事儿了，”路易莎说。“起初他告诉我他从来没借过汉娜，然后又说汉娜还我的时候没破。之后又说是借的时候汉娜已经破了，还有什么一个破娃娃实际上比好娃娃更迷人，因此要是汉娜没破，就太丢人了……”

“但她破了！”

“对，她破了就对了。然后他告诉我，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破娃娃都是完整的，每个好娃娃都是支离破碎的。”“他是个疯子！”“对，他是个疯子。他顺着那股疯劲，说汉娜破了也没破，取决

于你怎么看它。然后他说，虽然娃娃是我的，破的部分是他的，还有他弄破汉娜是为她自己好。然后爸爸就开始哭，说没有东西可以取代我的破汉娜，所以“这就是没有东西！”，然后他就做得好像递给了我没有东西。”

“老实说！欠抽的！”

“他还没完。他告诉我——非常严肃地——现在重要的不是破娃娃，而是娃娃她如何伤了我们的心，因而让我们结为一体并和我们同在。‘我们都被这个不正常的娃娃汉娜伤了心，’他说，‘她也因此治愈了我们。’听到这个我也开始哽咽了。我爹，他是个聪明的老混蛋。”“他的确也是这样。”

当我说齐泽克是我爹时，我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著作年谱

- 2012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London: Verso
- 2012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 2010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 2009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with Alain Badiou).
- 2009 *Mythology, Madness and Laughter: Subjectivity in German Idealism*.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with Markus Gabriel).
-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 2009 *In Search of Wagner(Radical Thinkers)*. London: Verso(selected texts of Theodor W. Adorno with introduction by Žižek).
- 2009 *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with John Milbank).
- 2008 *Violence: Big Ideas/Small Books*. New York: Picador.
- 2008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 2006 *How to Read Lacan*. London: Granta Books.

- 2006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2006 *The Universal Exception*.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2005 *Interrogating the Real*.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2004 *Iraq: The Borrowed Kettle*. London: Verso.
- 2003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2003 *Organs Without Bodies*. London: Routledge.
- 2002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Žižek on Lenin, the 1917 Writings*. London: Verso.
- 2002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London: Verso.
- 2001 *On Belief*. London: Routledge.
- 2001 *Opera's Second Death*. New York: Routledge.
- 2001 *The Fright of Real Tears: Krzysztof Kieślowski Between Theory and Post-Theo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BFI).
- 2001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London: Verso.
- 2000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London: Verso.
- 2000 *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with Judith Butler and Ernesto Laclau). London: Verso.
-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London: Verso.
- 1997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
- 1996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Essays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Verso.
- 1994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London: Verso.
- 1993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London: Verso.
- 1993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Enjoy Your Symptom!* New York: Routledge.
- 1991 *Looking Aw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1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London: Verso.
-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关于作者及编者

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已经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包括《斜眼而视》(*Looking Awry*)，《木偶与侏儒》(*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和《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

莫滕森 (Audun Mortensen)，生于 1985 年，写了两本诗集，一部小说，以及《齐泽克笑话精选》(2011) 大画册限量版插图的第一部分。现居柏林。

莫墨斯 (Momus)，1960 年生于苏格兰的尼克克里，出了二十多张唱片和三本书。他出版于 2008 年的第一部小说《笑话书》，讲述了一个极为不正常的家庭，设定其中人物的生活陷入在一系列下流、残酷的笑话里。他的最新唱片是《图书馆》(*Bibliotek*, 2012)，他称之为“田园恐怖”风格。现居日本大阪。

注释

除非特别注明，所有的笑话均来自未发表的手稿。

1.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London: Verso, 2012), 39–40.
2. *Less Than Nothing*(London: Verso, 2012), 599.
3. Ibid., 538.
4. Ibid., 89.
5. Ibid., 325.
6. Ibid., 277.
7. Ibid., 494.
8. Ibid., 422.
9. Ibid., 696–697.
10. Ibid., 708–709.
11. Ibid., 745–746.
12. Ibid., 765–766.
13. Ibid., 788.
14. Ibid., 768.
15. *Living in the End Times*(London: Verso, 2010), 27.
16. Ibid., 401–402.
17. *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9), 42.
18. Ibid., 286.
19.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299–300.
20. *Violence: Big Ideas/Small Books*(New York: Picador, 2008), 11.

21.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London: Verso, 2008), 268.
22. *Ibid.*, 306–307.
23. *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270.
24.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 Verso, 1989), 147.
25.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London: Verso, 1991), 173.
26.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318.
27. *Ibid.*, 331.
28. *How to Read Lacan*(London: Granta Books, 2006), 69–70.
29. *The Parallax View*(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64.
30. *Ibid.*, 109–110.
31. *Ibid.*, 178–179.
32. *Ibid.*, 351.
33. *How to Read Lacan*, 43.
34. *The Parallax View*, 353.
35. *Ibid.*, 401.
36. *Ibid.*
37. *Ibid.*, 413.
38. *Interrogating the Real*(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5), 13.
39. *Iraq: The Borrowed Kettle*(London: Verso, 2004), 4.
40. *Violence*, 44.
41. *Iraq*, 70.
42. *Ibid.*, 132.
43.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49.
44. *Ibid.*, 101.
45. *Ibid.*, 137–138.
46. *Ibid.*, 182.
47. *Organs Without Bodies*(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8–59.
48. *Ibid.*, 60.
49. *Ibid.*, 61.

50. Ibid., 77–80.
51. Ibid., 158.
52.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74.
53.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Žižek on Lenin, the 1917 Writings* (London: Verso, 2002), 206.
54.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London: Verso, 2002), 1.
55. Ibid., 3.
56. Ibid., 77.
57. Ibid., 92.
58. *On Belief* (London: Routledge, 2001).
59. *The Fright of Real Tears: Krzysztof Kieslowski Between Theory and Post-Theo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1), 29.
60.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London: Verso, 2001), 147.
61. Ibid., 190.
62.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London: Verso, 2000), 50.
63. Ibid., 50–51.
64. Ibid., 53–54.
65.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 1997), 25.
66. Ibid., 39.
67. Ibid., 46.
68. Ibid., 110.
69. Ibid., 172.
70. Ibid., 179.
71. Ibid., 188–189.
72.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Essays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Verso, 1996), 198.
73.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London: Verso, 1993), 44.

74.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244.
75. *Ibid.*, 268.
76. *Enjoy Your Symptom!* (London: Routledge 1992), 10.
77.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6–7.
78. *Ibid.*, 29.
79. *Ibid.*, 64.
80.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London: Verso, 1994), 143.
81.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65.
82. *Ibid.*, 66.
83. *Ibid.*, 159.
84. *Ibid.*, 160.
85. *Ibid.*, 163.
86. *Ibid.*, 175–176.
87. *Less Than Nothing*, 243.
88. *Ibid.*, 1003.
89. *Ibid.*, 530–531.
90. *Ibid.*, 535.
91. *Ibid.*, 538.
92.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1.
93.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197.
94. *Ibid.*, 198.
95.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13.
96.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110–111.
97. *The Universal Exception*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 316.
98. *Organs Without Bodies*, 145.
99. *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16.
100.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212.
101. *Ibid.*, 223.
102. *The Ticklish Subject* (London: Verso, 1999), 382–383.

译后记

能译齐泽克是偶然的机缘。一日，Y问我：“麻省理工刚给齐泽克出了本笑话集，体量不大，有没有兴趣做一下？”Y浸淫学术出版多年，专业且眼光独到，更何况还有麻省理工和齐泽克的名头，我欣然领命，心下还有几分惠而不费的窃喜。

于是，约好半年交稿。适逢加拿大访学，所到之处地广人稀、秋水长天，得以静心通读全书，然后，前许确幸荡然无存。《齐泽克的笑话》虽然体量不大，且段段留白，分段成页，但内容编排并不松散，无论随手翻开哪页，都得前后参阅，似草蛇灰线，细究之下，又隐入无间，不知不觉多少页翻过，仍不得甚解。

最深陷知识诅咒的，大概就是哲学家。整日艰苦思维，不断概括抽象基本常识和推导过程，在脑中封装成块，以备更复杂思考之用。哲学家信手拈来一个概念，同道或会心莞尔，圈外人则茫然无得。齐泽克的笑话，多是讲给同道的。不仅如此，齐泽克于哲学，可比作金庸笔下的周伯

通，嬉笑怒骂只是皮相，内里却是精通各派武功，兼收并蓄又自成一派。所以，为了不失信于友，我只能循着笑话里的隐约鳞爪去补课，重新读黑格尔、读拉康、读弗洛伊德、读边沁、读巴迪欧……当然还有那些专门以齐泽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一篇以“某人在华沙”这个笑话为核心素材，结合拉康足足讨论了二十多页！于翻译的实际产出量，这些阅读多属徒劳无功；而且读得越多，内心越挣扎不安，但想着，无论多么失信，延期多久，但求别成为哲学译圈的“常凯申”。期间，也试着拿自觉有趣的译稿给妻子读，反馈一直是：无趣、拗口。心下黯然之余，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没能把齐泽克译得更有趣，却可能被他的重口说教改变了趣味。

如是，一拖再拖，一年后勉强交出初稿。Y虽宽和如往常，却总是错过了之前的出版时机，又大约半年审校，排好版下厂付印前，我仍内心忐忑，于是和Y提出，最后再校一次。Y欣允。结果，因改动太多，印刷版校废。这次，Y微有责色，但也只说了句：“你就好好改吧。”学术出版生存维艰、经费捉襟见肘，更何况多位同仁此前数月辛苦，大抵又得再来一遍。而我也只能惭然，无言可对。

翻译是译者无尽的苦难，每隔一段时间，看自己的译稿，都会意识到，最好的翻译还在别处，如同《荷马史诗》里的西西弗斯，每天把石头奋力推到山顶，但山顶既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而只是周而复始的一部分。像齐泽克对上帝造人的挪揄：“别从知识之树上吃东西！”面对新的知识、不断进化的文明，我们都是猴子，只有通过好的诠释翻译，理解和分享才可能发生。所以，译者的责任，就在于让树上有更多可以吃的果子。因而，我也不以“错漏难免”之类的防御性套话作结；这个时代，树上的果子不计其数，能摘到就是大机缘，至于食后效果，不必太较真，猴子变人，本来就是笑话。

2016年3月3日

记于奥胡斯